

「戰爭」自遠方來：

論晚清戰爭小說的譯介流動和風格樣態

朱 芯 儀^{*}

摘 要

晚清中國動亂頻仍，然文學改革活動極為蓬勃，「戰爭」議題的小說數量繁多。中國譯者向西方、日本取經，譯介相關的域外小說，渴望「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文聚焦晚清譯介戰爭小說，原著來自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莫泊桑（Henry René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及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等世界文豪，其作品由不同譯者翻譯，如陳景韓（1878-1965）、楊與齡（1875-1953）、王國維（1877-1927）等譯為中文。內容關注少年從軍、軍事教育與反思戰爭等議題，反映近代中國對世代傳承、政治改革與國族困境之焦慮。譯者翻譯策略折射自身生命、境遇、思想、立場，甚至不囿「保家救國」框架，展現超然文學審美，獨樹一幟。

筆者將分析下列文本：首先為1903年刊載於《浙江潮》的《少年軍》系列小說，其鼓勵「少年」從軍，勇於承擔國家重任，顯露晚清「老大」、「少年」的世代差異。再者為經歷多次重譯，轉向專業的

*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教戰風格，刊登於《南洋兵事雜誌》的《義勇軍》。最後則是1905年刊登於《教育世界》的《枕戈記》，譯作保留原著者的文學特色和人道理念，細膩描繪戰場苦旅和景物風光。筆者探討上述文本，挖掘晚清時期，雜揉語言譯介、譯者思維、政治取向與美學考量下，多元且深刻的文藝特色。

關鍵詞：晚清小說、譯介、陳景韓、楊與齡、王國維

“War” from Abroad:

Translation Movement and the Styles of War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sin-i Chu^{*}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wars in China. Literary reform activities were flourishing. The number of novels on the subject of “war” was enormous. Chinese interpreters translated related novels from the West and Japa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war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originals came from Victor Hugo (1802-1885), Henry René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and Leo Tolstoy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Their works were translated by various translators, such as Chen Jinghan (1878-1965), Yang Weiling (1875-1953), and Wang Guowei (1877-1927). These novels were concerned with a young man’s military service, military education and a reflection on war. It

^{*} Ph. 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echoes the anxiety of modern China about the inheritance of generations, political reform and national dilemma.

Keywords: Late Qing, translation, Chen Jinghan, Yang Weiling, Wang Guowei

「戰爭」自遠方來：

論晚清戰爭小說的譯介流動和風格樣態^{*}

朱 芯 儀

一、前言

19世紀的戰爭經常跨越領土，發生在不同國度，更是世界資源變遷、人口移動的主要動力之一。因此讓近代「戰爭」的相關議題包羅萬象，複雜無端，「戰爭文學」隨之層次錯落，充滿變數。楊傳鑫主張，20世紀的戰爭文學「是20世紀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所描述的戰爭事件，有著歷史著作缺乏豐富性、生動性和具體性等特點。」¹藉由研究「戰爭」譯介，觀察晚清中國的時代軌跡，勾勒文本行旅中碰撞、接受、融合的深刻印記。

各國作家運用從軍時的所見所聞，作為創作小說素材，再經譯者譯介而廣為流傳。晚清譯者翻譯來自世界各國的戰爭小說，新的「戰爭」意象也同時被引薦至中國。晚清「譯介」戰爭小說，開創殊異於

^{*} 本文初稿曾在2021年4月15日於清華大學「春知意新：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發表，感謝評論人鄭文惠教授、劉苑如教授、黃錦珠教授、顏健富教授。感謝曾給予本篇論文諸多建議的潘少瑜教授、鍾欣志教授、楊佳嫻教授、羅仕龍教授、賴佩暄教授、吳億偉老師及兩位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

¹ 楊傳鑫：〈時代的報告，歷史的見證——20世紀的戰爭及戰爭文學〉，《世界文化與文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84-88。

往昔的敘事範式，深藏國族危機、傳承焦慮、蒼涼感懷等情緒。文化翻譯學派學者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於〈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提及，翻譯研究不再是譯出語（source language）或譯入語（target language）轉換的問題，更涉及語境、歷史與文化背景。² 謝天振延伸此觀點，發展「譯介學」（Medio-Translatology）：

（譯介學）它關心的不是語言層面上出發語與目的語之間如何轉換的具體問題，它關心的是原文在這種外語和本族語轉換過程中源語資訊的失落、變形、增添、擴伸等問題……。³

據此，筆者欲探討譯本（或譯本與譯本之間）所展示的文學樣態，挖掘文字之後的意識形態、翻譯背景、傳播媒介（報刊）、譯者策略等。據此，本文列舉三部作品，各代表晚清譯介的三種趨向：⁴ 其一，小說投射清末國族困境，寄託「少年」救亡圖存的「政治意識」；其次，譯者具有軍方立場，大幅改譯故事，走向「軍事教育」風格；最後，小說傳達人道哲思，「反思戰爭」意義，超越同時期文學之價值。本文闡述晚清「戰爭譯介」三種型態，反映譯者「譯介」的意向與策略，分析譯介軌跡和敘事觀點。

² “We called this shift of emphasis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uggested that a study of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combined with the praxis of translating could offer a way of understanding how complex manipulative textual processes take place: how a text is selected for translation, for example, what role the translator plays in that selection, what role an editor, publisher or patron plays, what criteria determine the strategies that will be employed by the translator, how a text might be received in the target system.” 見蘇珊·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文化構建：文學翻譯論集》（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23-124。

³ 謝天振：《譯介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頁1。

⁴ 筆者並非意指晚清譯介戰爭小說僅有此三種面向，而是「政治」、「軍事教育」與「戰爭反思」三個面向或占據多數，或一枝獨秀，體現當時政治、軍事改革的時代背景及難得的「戰爭」反思。

首先，1903年，陳景韓以筆名「喋血生」翻譯，刊登於《浙江潮》第1、7、9期的獨立短篇小說，集結為《少年軍》系列小說。原著為德富蘆花（1868-1927）《近世歐米歷史之片影》（近世歐美歷史之片影）；⁵ 愛德蒙多·德·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1846-1908）《愛的教育》（*Cuore*）⁶ 中的〈少年鼓手〉（Il tamburino sardo）；雨果《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的〈ABC之友〉（Les amis de l'abc）。《少年軍》系列小說來自三個不同國度、不同戰爭背景，同樣符合中國當時「少年救國」氛圍。

再者，莫泊桑《俘虜》（*Les prisonniers*），⁷ 最初刊登於1884年12月30日的《吉爾白拉日報》（*Gil Blas*），後由日人橋本青雨（1878-1944）翻譯為《義勇軍》。晚清自1904年後，《義勇軍》被不同譯者反覆翻譯，形成《義勇軍》旋風。其中又以《南洋兵事雜誌》上楊與齡的版本，最為特殊，逐漸趨向「軍事化」、「專業化」與「嚴肅化」，顯示彼時文學服膺「軍事啟蒙」的現象和策略。

最後，1905年《教育世界》刊載的《枕戈記》，譯者為王國維（1877-1927）。原著是1855年，托爾斯泰的《伐林》（*Рубка леса*）。⁸ 1904年，二葉亭四迷（1864-1909）翻譯為《つゝを枕》（睡在火槍上）。1905年經王國維翻譯、潤飾，刊登在《教育世界》。樽本照雄考證《枕戈記》為托爾斯泰最早傳入中國的小說。⁹ 《枕戈記》風格特殊，不像同時期戰爭小說調性「激昂」，保留托爾斯泰對戰爭的「反思」與人道信仰。

⁵ 德富健次郎編：《近世歐米歷史之片影》（東京：民友社，1893年）。

⁶ 義文版本參見Edmondo de Amicis, *Cuore* (New York: H. Holt, 1896).

⁷ 法文版本參見Guy de Maupassant, *Contes choisis: Les prisonniers; L'auberge; L'aventure de Walter Schnaffs; Amour; Deux amis; La peur; La mère sauvage* (London: Bell, 1927).

⁸ 俄文版本參見Тол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Рубка леса* (Москва: Воениздат, 1947).

⁹ 樽本照雄：〈トルストイ最初の漢訳小説——「枕才氣」について〉，《大阪經大論集》第50卷第6號（2000年3月），頁383-394。

藉由三部譯介作品，試問清末譯介戰爭小說究竟傳遞何種文化意涵？譯者運用敘事技巧，如何展開對話與競逐，表達多層次的概念？又開拓了什麼樣的敘事典範與戰爭價值？以下將論之。

二、「戰」自遠方來：其人、其事、其翻譯

十九世紀的歐洲各國對內政治紛亂，對外進行侵略，宗教變革、信仰衝突，造成歐洲大陸局勢動盪。這些征戰經驗，由西至東散播開來，西方與東方的關係，宛如光與影，相互影響和投射。¹⁰

此時期的作家幾乎都在「戰爭」的環境中成長，或曾親身參與戰事。對他們而言，「戰爭」不只意味著世局分崩離析，亦藉此豐富了人生閱歷，滋養了作品層次。作家們藉由書寫「戰爭」，抒發愛國情懷、時局動盪、人性善惡，亦反映了當下戰時景況。知名法國作家雨果，出生於軍事家庭，童年時期因父親經年在外行軍，一家人隨之奔波流離。他的後半生因拿破崙三世政變、巴黎圍城之戰，流亡海外，一生幾乎歷經法國重大事變。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原本反對戰爭的雨果，決意回到巴黎，以高齡68歲加入國民兵。¹¹ 作品流露人道關懷，暴露社會現實和殘酷，《悲慘世界》便是最佳例證。1903年，《悲慘世界》譯入中國，陸續經由不同的譯者譯介與詮釋。¹² 本文關

¹⁰ 張江寧主編：《外國名家重大軍事改革述評》（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16-123。

¹¹ 雨果生平事蹟見鄭克魯編著：《法國文學史2》（上海：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625-631；柳鳴九：〈雨果其人，雨果奇觀〉，《柳鳴九文集》第3卷（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年），頁20-36。

¹² 1903年，蘇曼殊（1884-1918）在上海《國民日日報》發表《慘社會》，屬名為「法國大文豪叢俄著，中國蘇子谷譯」，僅登十回便因報館被封而不了了之。爾後，鏡今書局又出改了名的單行本《慘世界》，由蘇子谷與陳仲甫同譯。見柳亞子：〈《慘社會》與《慘世界》〉，蘇曼殊著，柳亞子編訂：《蘇曼殊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16年），頁359-362。至於蘇曼殊翻譯的版本與經過，見強勇傑：〈蘇曼殊《慘社會》的底本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8期（2015年6月），頁187-266；強

注的《少年軍（三）》的原著〈ABC之友〉便出自其書。〈ABC之友〉原為法語「abaissé」，意指「被打壓的人們」、「受屈辱的人們」。故事中，學生們在咖啡廳秘密集會，談論國家政治、籌辦抗爭活動，探討少年、學生們參加社會運動所面對的複雜情境與矛盾心境。

同樣受到戰爭影響的法國作家莫泊桑，擅長短篇小說，描繪市民、農人、工人與軍人階層的生活，作品幽默且富感染力。普法戰爭爆發，莫泊桑和雨果一樣參軍出征，戰後繼續在海軍部門任職。軍旅生活成為他日後創作小說的重要素材與靈感，《俘虜》便是因此而出。¹³ 另一位義大利作家愛德蒙多，16歲進入摩德納軍事學院，學習軍事技能。第三次義大利獨立戰爭時，戰場上的腥風血雨，深刻地刺激了他。戰爭結束後，愛德蒙多立即退出軍隊，1868年國防部《義大利軍事》（*L'Italia militare*）替其出版了《軍旅隨筆》（*La vita militare*），紀錄戰場前線生活。1886年，《愛的教育》出版，大受歡迎，被譯為各國語言，廣為流傳。《愛的教育》為學生安利柯（Enrico）的日記，《少年軍（二）》原著《少年鼓手》取自第四章一月的日記。相比1909年包天笑翻譯《愛的教育》為《馨兒就學記》，¹⁴《少年軍（二）》譯入時間還早了許多。

同時期俄國作家托爾斯泰，1851年前往高加索當兵，1854年參與克里米亞戰爭，體會到戰爭的無情與殘酷。他將戰爭經驗書寫成《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描繪戰場上的攻防、非人道，抨擊戰爭「無意義的死亡」。托爾斯泰的創作初期

勇傑：〈《慘世界》譯者的爭議：答案就在文本細節裡〉，《翻譯學研究集刊》第18輯（2014年12月），頁69-100。

¹³ 相關引用研究參見：未標示作者：〈莫泊桑生平與創作年表〉，收於莫泊桑著，李玉民譯：《莫泊桑短篇小說選》（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2014年），頁250。

¹⁴ 包天笑翻譯《愛的教育》為《馨兒就學記》的過程，見陳宏淑：〈譯者的操縱：從Cuore到《馨兒就學記》〉，《編譯論叢》第3卷第1期（2010年3月），頁41-68。

與「戰爭」相當緊密，¹⁵《伐林》便於高加索時期完成。小說運用獨特的「心理辯證法」：「寫人物在外界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中心理狀態的層層變化」，¹⁶表現寫實、反諷之特色，敘事緩慢並客觀。¹⁷托爾斯泰觀察自我生命裡的軍旅時光，抽取途中發生的事件、人物、景緻，描寫國家體制下的底層軍隊，表露荒謬、無助與哀戚的複雜情感，積累為1865年作的傳世經典《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少年軍》作者之一為日本近代文豪的德富蘆花，深受托爾斯泰的影響，¹⁸1906年曾前往俄國拜訪托爾斯泰。回國後寫下《順禮紀行》，紀錄和托爾斯泰見面的情景。¹⁹他跟隨兄長德富蘇峰（1863-1957）加入「民友社」，從事翻譯與校對的工作，持續在《國民之友》、《國民新聞報》發表作品。這段期間，德富蘆花閱讀大量的外國著作，創作風格寫實，貼近社會底層，善於描摹自然景物，作品有《不如歸》、《黑潮》、《自然與人生》等。關懷政治改革、國家興亡的德富蘆花，因托爾斯泰的啟發，轉為支持人道主義、斥責戰爭侵

¹⁵ 劉亞丁認為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期的著作可分為兩部分：其一，止於50年代中期，與俄羅斯帝國政府的拓疆立場是比較吻合的，儘管他對俄羅斯將軍縱容殺戮搶掠等有反思。其二，開始於90年代，則在超越帝國軍隊與反叛山民的對立中反思了人性問題。見劉亞丁：〈19世紀高加索戰爭的文學再現——以萊蒙托夫和列·托爾斯泰的行旅和創作為例〉，《俄羅斯研究》第2期（2011年4月），頁39。

¹⁶ 周曉明：「從《童年》開始到《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托爾斯泰形成發展著自己的『心靈辯證法』，他不對人物心理作孤立靜止的抽象描寫，而是結合著人物的具體行動，寫人物在外界客觀事物的發展變化中心理狀態的層層變化。」見周曉明：〈從《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看托爾斯泰的藝術思想〉，《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1986年3月），頁108。

¹⁷ 歐茵西：〈托爾斯泰的寫作藝術〉，《中外文學》第3卷第12期（1975年5月），頁140-150。

¹⁸ 李慧：《德富蘆花文學所受托爾斯泰的影響——以小說《黑潮》與隨筆集《自然與人生》、隨筆《謀叛論》的關係為視域》（上海：華中師範大學日語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頁9-13。

¹⁹ 德富蘆花：〈トルストイ翁訪問〉，《順禮紀行》（東京：警醒社，明治三十九年〔1906〕），頁282-286。

略。其所著《トルストイ》（托爾斯泰），更是日本認識托爾斯泰的重要著作。²⁰

無論是雨果、莫泊桑、愛德蒙多、托爾斯泰，還是德富蘆花，都是世界級的偉大文豪。作品在明治時期被翻譯、被關注，輾轉譯介至中國。明治前十年（1878-1887），日本因應政治需求，大量翻譯英雄冒險、社會改革的文學著作，改寫原著內容，以符合改革、維新訴求。明治二十年代（1888-1897），翻譯文學成熟，譯者開始重視原作者、原著本身的文學性與意義，採取「直譯」方式，外國文學正式對日本文學理念、創作產生影響。²¹ 知名的文學家、翻譯家二葉亭四迷即是指標性人物。

二葉亭四迷本名長谷川辰之助，在日本和俄國產生千島、樺太糾紛時，未能投身軍旅，所以興起「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念頭，至東京外國語學校學習俄語，以便了解強敵俄國。求學時接觸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別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等俄國作家、作品，奠定獨特的文學觀點，開啟翻譯俄國作品之契機。爾後，任職於內閣官報局，從事英、俄文報紙的翻譯工作。他深受坪內逍遙（1859-1935）《小說神髓》的影響，開創日本寫實主義「文言一致」的小說理論和文學評論，著書《小說總論》。其翻譯外國文學，譯筆風格忠於原著，使用近口語語體，力求呈現原著情節和角色特徵。²²

²⁰ 德富蘆花：《トルストイ》，《拾貳文豪》第10卷（東京：民友社，明治三十年〔1897〕4月）。

²¹ 徐靜波：〈明治時期日本翻譯文學述論〉，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研究論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56-468。

²² 王述坤編：〈《浮雲》與二葉亭四迷〉，《日本現代文學：名家及其代表作》（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4-25；甘麗娟：〈寫實主義理論在日本近代的發展與變異〉，《齊魯學刊》第4期（2010年7月），頁124-127；鄭青：〈簡述近現代日本的俄國文學輸入〉，鄒東來、程千山主編：《東北亞語言文化研究》第1輯（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64-65。

另一名譯者橋本青雨，原名橋本忠夫，宮城縣人，中學時期與吉田作造（1878-1933）一同創辦《如蘭會雜誌》。²³ 他憑藉優秀的文學才情，順利考取東京大學德文系，往後在中央大學從事創作、翻譯與德語教學。²⁴ 橋本青雨翻譯了許多德國名著，對德國文學傳入日本不遺餘力：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Jacob Ludwig Karl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Carl Grimm，1786-1859〕）的《格林童話》（*Grimms Märchen*）（1931）；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作品《魔靈》（*Der Dämon*，1927）、《獾皮》（*Der Biberpelz*，1943）等。他撰寫《世界文學史》（1907）；德語教材《獨逸語研修》（1916-1918）、《獨逸語講座》（1927-1928）等，相當了解世界文學的趨勢並注重德語的學習。

這些優秀的日本譯者，將外國作品翻譯成日文，並或多或少地改譯了小說內容，添加彼時日本所需要的「維新」元素。《少年軍》的日譯者原抱一庵（1866-1904），筆名「抱一庵主人」。少年時期的他為了爭取自由民權，參加「福島事件」而被逮捕，最後因未成年被政府釋放。他陸續至中國上海「亞洲學院」、日本札幌農業學校就讀，卻對翻譯小說產生濃厚的興趣而停止了課業。1890年至東京擔任文學記者、小說譯者。原抱一庵的譯介風格通俗，²⁵ 尤專注於兒童讀物，主要在《少年園》、《少年世界》執筆、譯介，開創了日本兒童文學史嶄新的作品風格。²⁶

這些譯者因為明治維新的關係，直接地影響了譯作風格、翻譯策

²³ 吉田作造：〈少年時代の追憶〉，《文芸春秋》9月号（東京：文芸春秋，1926年9月），頁65-69。

²⁴ 其著作有小說與俳句《星草集》、小說《愛的犧牲》、《詩人海涅》、《男女觀附錄·人生之意義》、《世界文學史》、《獨逸語的修辭過程》等。翻譯作品刊登於《帝國文學》、《新小說》、《新聲》。

²⁵ 張艷：〈陳冷血兩篇翻譯小說的日語底本——兼析明治文學的影響〉，《清末小說》第35期最終號（2012年12月），頁152。

²⁶ 大木葉子：〈原抱一庵「少年小説 新年」論——その固有性の内実について——〉，《日本文芸論稿》第36號（2013年9月），頁1-12。

略。於是，托爾斯泰《伐林》，被二葉亭四迷定調為「軍事小說」，莫泊桑幽默諷刺的《俘虜》，被橋本青雨譯為忠勇情懷的《義勇軍》，²⁷刊登在政治意味濃厚的《太陽》雜誌上。²⁸原抱一庵則熱衷「少年革命」元素，將雨果《悲慘世界》裡青年革命的情節拼湊為《ABC組合》。這時的日本作家、譯者，因救國的政治考量，無論是創作或譯作，難免帶有呼籲、鼓勵從軍的意味。

此時的中國，連吞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等敗仗，譯者陳景韓，筆名「冷血」，亦身陷其中。陳景韓筆名眾多，如冷、冷血、喋血生、不冷、華生、無名、新中國之廢物等，曾於武昌武備學堂接受新式軍式教育，又因參加革命黨遭到清政府通緝。1899到1902年間，他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修習文學。他一生參與眾多知名報刊的編輯，如《江蘇》、《新新小說》、《大陸》、《申報》與《時報》等。陳景韓關懷時政，創作小說《催醒術》，盼能喚醒沉睡已久的中國人民。²⁹他血性、真摯的個性，也譯介許多戰爭、軍事題材的小說，包含本文研究的「少年軍」系列小說和《義勇軍》，翻譯產量驚人。

²⁷ モーパッサン著，橋本青雨譯：《義勇軍》，《太陽》第10卷第13號（東京：博文館，1904年），頁108-115。

²⁸ 《太陽》雜誌其命名「太陽」意義為「現在進攻大陸的日本受到亞洲乃至世界的注目，是充滿榮光的國家，其存在正如同『太陽』一般」經常邀請當時，各界第一流的名家執筆。梁啟超《時務報》已有翻譯《太陽》雜誌之文章，同時《清議報》的文章也被《太陽》所採譯。見潘世聖：〈近代日本雜誌媒體的「中國」與「中國言說」——關於綜合雜誌《太陽》（1895-1928）研究〉，收於袁筱一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外語論叢》第2輯（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65-178；吉田薰：〈梁啟超與《太陽》雜誌〉，《學術研究》第12期（2008年），頁140-160。

²⁹ 關於陳景韓的研究見郭浩帆：〈《新新小說》主編者新探〉，《出版史料》第2期（2004年），頁100-103；李志梅：《報人作家陳景韓及其小說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蔡登山：〈「外冷心熱」的報人與小說家陳冷血〉，《洋場才子與小報文人》（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頁3-15；李艷麗：〈虛無黨小說與無政府主義思潮考〉，《晚清日語小說譯介研究（1898-191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頁48-52。

《義勇軍》刊於陳景韓主辦的《新新小說》，立場支持革命，藉文學之力，啟蒙民智。《義勇軍》是「白毛石氏」莫泊桑首部被譯介至中國的作品，其他著作陸續譯為中文。如1909年，魯迅（1881-1936）、周作人《域外小說集》，選譯莫泊桑小說《月夜》（*Clair de lune*）；1917到1918年間，胡適於《新青年》、《每周評論》，翻譯《二漁夫》（*Deux amis*）、《梅呂哀》（*Menuet*）、《殺父之兒》（*A Parricide*）等。³⁰ 胡適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提及譯介莫泊桑的原因：「短篇小說是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³¹ 顯然，莫泊桑作品在近代備受重視，基於「短篇小說」形式簡潔、旨意明確，符合出版「經濟」考量。

《義勇軍》內容演繹「民眾成軍」，出於宣導「革命」、「起義」的考量。往後，《義勇軍》再由不同的譯者，翻譯成不同版本，儼然形成「義勇軍」風潮。1909年楊與齡在《南洋兵事雜誌》發表的《義勇軍》，為符合政治需求和軍事目的，大幅度刪改小說內容，值得注意。楊與齡，字珥珊，號太晚，生平資料不多。³² 他特別重視軍事訓練、戰事攻防等「實戰」議題，長期在《南洋兵事雜誌》發表評論、刊登小說。《南洋兵事雜誌》未標註《義勇軍》為翻譯小說，看似其創作，但深入小說題名、架構與內容，則可確定為莫泊桑《俘虜》的譯作，³³ 不過已經完全脫離了原著的旨意。

本文所涉及的另一篇小說《枕戈記》，刊登在別具意義的刊物——《教育世界》。1904年，王國維（1877-1927）受羅振玉委託，

³⁰ 黃靜：《晚清民國時期中國文學的歡場書寫研究》（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46。

³¹ 胡適著，杜春和等編：《論短篇小說》，收於《胡適演講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57-260。

³² 左鵬軍：《晚清民國傳奇雜劇文獻與史實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56。

³³ 筆者研究比對，發現楊與齡版和冷血版、《大陸》版的《義勇軍》高度雷同，推測楊與齡乃依循冷血版與《大陸》版為底本，再做添改、延伸。

接任《教育世界》主編，同時在江蘇師範學堂任教。他擔任《教育世界》主編期間，因應時局多變，遂減少刊載教育章程的篇幅，加入更多文學、哲學的譯文，將他國文化與思想，益加深刻地引薦至中國，尤其是托爾斯泰的作品。³⁴ 托爾斯泰的創作、思想與政治理念，亦在此時期進入中國。他與中國交往密切，曾與張慶桐（1872-?）、辜鴻銘（1857-1928）通信，表達感佩、嚮往之情，並體恤人民長期受到西方的侵略，同情清政府在日俄戰爭所受的委屈。

托爾斯泰最早出現在近代中國乃1900年廣學會出版《俄國政俗通政》，出現了「俄國爵位劉（名）都斯篤依（姓）」的譯名，介紹生平與著作。1903年，單士釐（1856-1943）著《癸卯旅行記》，抒發對托爾斯泰的尊敬與佩服。此外，1907年《萬國公報》刊登了托爾斯泰的小說《仁愛所在上帝所在》、《以善勝俄論》。辛亥革命之後，林紓（1852-1924）翻譯托爾斯泰《現身說法》、《恨縷情絲》、《羅刹因果路》、《人鬼觀火》、《樂師雅路白忒遺事》五篇長篇小說。³⁵ 五四時期的作家如魯迅、³⁶ 茅盾（1896-1981）、瞿秋白（1899-1935）、郭沫若（1892-1978）、梁實秋（1903-1987）等人，受到托爾斯泰的影響甚深，為其撰文、翻譯或對話。³⁷

反觀托爾斯泰第一部漢譯作品《枕戈記》，倒是較少被提及。其先作為江蘇師範學堂的習作和文課本，爾後依照日文版《つゝを枕》

³⁴ 呂順長：《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89。

³⁵ 程翔章：〈中國近代文學家對托爾斯泰的認識和介紹〉，《晚清文學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廣東出版公司，2014年），頁145-154。

³⁶ 魯迅〈破惡聲論〉中反駁托爾斯泰「無政府主義」主張國界乃是人類衝突之因，亦反對托爾斯泰「莫如不奉命」觀點，主張中國不似英、日、俄三國持進化論而好鬥，攻擊弱小國家。見汪暉：〈聲之善惡：什麼是啟蒙？——重讀魯迅的〈破惡聲論〉〉，《聲之善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頁3-89。

³⁷ 陳建華編：《文學的影響力——托爾斯泰在中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

翻譯、潤色而刊登《教育世界》。³⁸ 學界普遍主張《枕戈記》譯者為王國維，³⁹ 筆者認為，王國維翻譯《枕戈記》可信度極高，且有跡可循。1904年，初為《教育世界》主編的王國維，便已翻譯〈托爾斯泰伯爵之近世科學評〉一文，刊登《枕戈記》後，1906到1907年間，《教育世界》陸續介紹了〈脫爾斯泰之四戒〉與〈脫爾斯泰傳〉，⁴⁰ 王國維對托爾斯泰的欣賞和認同，顯而易見。《枕戈記》代表了王國維介紹域外文學的初衷，傳播外國思想的理念，使晚清戰爭敘事另闢蹊徑。

據此，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戰爭」、「軍事」小說來到中國。中國譯者們基於當時的政治背景、救國焦慮與文學意識進行譯介，投射不同的情懷與象徵。一如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önflies Benjamin, 1892-1940）所言：「譯作呼喚原作但卻不進入原作，它尋找的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點，在這個點上，它能聽見一個回聲以自己的語言回蕩在陌生的語言裡。」⁴¹ 本文致力挖掘《少年軍》、《義勇軍》與《枕戈記》中譯本所呈現的「來世」樣貌，又如何激盪出專屬於「晚清」的「回聲」，展露彼時中／西、新／舊的政治立場、文學

³⁸ 托爾斯泰：《枕戈記》，《教育世界》第102期（上海：教育世界社，1904年），頁1。

³⁹ 《枕戈記》未標注譯者，經郭延禮、關詩珮、陳建華、劉夢溪等學者考察，認為譯者為王國維。見郭延禮：〈托爾斯泰小說的第一部中譯〉，《中華讀書報》，2000年4月20日；關詩珮：〈從林紓看文學翻譯規範由晚清中國到五四的轉變：西化、現代化和以原著為中心的觀念〉，《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8期（2008年8月），頁343-372；陳建華等著，陳建華主編：《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俄蘇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年），卷7，頁22；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要略（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頁275。

⁴⁰ 托爾斯泰：〈托爾斯泰伯爵之近世科學評〉，《教育世界》第89期（上海：教育世界社，1904年），頁1-8。見〈脫爾斯泰之四戒〉，《教育世界》第129期（1906年），頁2；〈脫爾斯泰傳〉，《教育世界》第143期（1907年），頁1-24。

⁴¹ 華特·本雅明：〈譯作者的任務〉，收於阿倫特（Hannah Arendt）編：《啟迪：本雅明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頁88。

價值、譯介策略。

三、少年軍何為而起哉？：《少年軍》的成長與救國

《浙江潮》乃革命黨的重要機關刊物，1903年於東京發刊，由留日學生「浙江同鄉會」編輯。創辦人蔣百里（1882-1938）為其撰〈發刊詞〉，說明辦刊目標：

我願我青年之勢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氣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聲譽，如浙江潮；吾願吾雜誌亦如之。⁴²

「青年」作為《浙江潮》的預設讀者，其勢力、氣魄與聲譽，如同浙江「錢塘江潮」般壯烈與洶涌，期許青年積極作為，從事革命運動。可知，近代中國「青年」、「少年」極受注目，並寄予「保家衛國」的厚望。1903年，《浙江潮》刊登《少年軍》系列小說，譯者開頭便問：「少年軍何為而起哉？」⁴³恰好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切入點，思考中國「少年」為何／如何加入「軍事體制」？《少年軍》何以藉由翻譯，逐步將少年「成長」與「從軍」畫上等式？並成為晚清譯介戰爭敘事的典範？

近代「少年」論述源自梁啟超（1873-1929），1900年〈少年中國說〉疾呼：「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⁴⁴保守老邁的中國，仍不放棄少年中國崛起之希望。梅家玲認為梁啟超「少年說」之意義：「晚清對『少年』的發現與意義重估，實有鑒於日本之藉『少年』以想像『國族』，憧憬『未來』。」⁴⁵「少年」、「教育」與「小

⁴² 蔣百里：〈《浙江潮》發刊詞〉，《浙江潮（東京）》第1期（東京：浙江同鄉會雜誌部，1903年），頁2。

⁴³ 喋血生：《少年軍（一）》，《浙江潮（東京）》第1期，頁1。

⁴⁴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409。

⁴⁵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

說」三者聯合體現當時啟蒙的重點：「青少年的奮鬥成長及學校教育生活，恰恰呼應了當時憧憬『少年精神』、強調教育啟蒙的社會現實，並為青少年的學習成長，提供具體的參考範式。」⁴⁶ 可知晚清「少年」承載諸多責任，包含教育人才、政治方針、軍事培訓等重大改革。

宋明煒梳理中國近現代「少年」文學和論述，發現晚清小說寄寓「少年」形象，使用「少年成長」的敘事架構，呼應實踐文明、進步的現代化幻想。⁴⁷ 於是清末報刊、雜誌經常出現「少年」一詞，無論是散文、小說、戲曲，盛行一時，例如：〈今日少年〉（《清議報》，1900）、《少年呀！》（《杭州白話報》，1902）、《二勇少年》（《新小說》，1902）、《少年軍》彈詞（《遊戲報》，1904）、《三百少年》戲劇（《浙園匯報》，1905）等。甚至作家以「少年」為筆名，例如「鐵血少年」、「濠鏡少年」、「同是少年」、「突飛之少年」、「少年中國之少年」等。報業出自「保種救國」的考量，與「少年」相關的「兒童」議題，相繼受到重視。報人期盼興發新式「兒童教育」，建構完善、豐富的教育體制，替中國注入新血。⁴⁸

《少年軍》系列小說的譯者喋血生，本名陳景韓，留學日本時接觸眾多外國文學，對「少年」尤其關注。他在《新新小說》連載「俠客談」專欄，〈敘言〉特別提及：

俠客談之作，為少年而作也。少年之耐性短，故其篇短。少年之文藝淺，見解淺，故其義其文淺。少年之通方言者少，故不

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6月），頁260。

⁴⁶ 梅家玲：〈教育，還是小說？——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收於陳平原等：《教育：知識生產與文學傳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97。

⁴⁷ 見宋明煒：〈青春想像〉，《批評與想像》（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49；Mingwei Song, *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⁴⁸ 見高玉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403。

用俗語。少年之讀古書者少，故不用典語。⁴⁹

可知，陳景韓對於「少年讀者」十分重視，依照少年「耐性短」、「文藝淺，見解淺」、「通方言者少」、「讀古書者少」等習性，調整創作與翻譯方式。他所翻譯《少年軍》系列，遵守「篇短」、「文淺」、「不用俗語」、「不用典故」的規則，適合少年閱讀。小說開宗明義即云：

記少年軍之歷史，僅得鳳毛麟角，雖然讀之令我之精神油然勃然，飛舞不止也！乃述其口吻，以正告我同胞少年。⁵⁰

小說憑藉「他國少年軍」的英勇事蹟，向中國「同胞少年」發出宣告，期許「同胞少年」閱讀後精神為之一振。

陳景韓如此重視「少年」，或許因為自身的少年經歷。1900年，爆發「唐才常事件」，又稱「自立軍起義」，⁵¹ 影響陳景韓甚深。唐才常（1867-1900）於維新敗後憤然起義，⁵² 陳景韓以學生身分加入運動，卻因此被武備學堂退學。此後，陳景韓徹底放棄「改革」，轉向革命，同時與前輩梁啟超決裂。⁵³ 可知，少年的陳景韓因為參與運動而遭受重大挫折，導致和師長對立，最終遠走他鄉至日本求學。陳

⁴⁹ 陳景韓：《俠客談·敘言》，《新新小說》第1卷第1期（上海：新新小說社，1904年），頁1-2。

⁵⁰ 喋血生：《少年軍（一）》，《浙江潮（東京）》第1期，頁1。

⁵¹ 唐才常、林圭等人發起「自立軍起義」，但受限經費籌措不足而失敗。當時康、梁二人均收到募款請求，兩人出三萬後，便再無所出，此後雙方心生嫌隙。起義最後因漢口失利，唐才常出師未捷身先死而結束。見陳宇翔編：《譚嗣同唐才常與維新運動》（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60-273。

⁵² 關於唐才常事跡：「戊戌政變，譚嗣同等六君子死焉。君在日京聞之痛極，欲航海復仇，不果。逾歲而有漢口發難之役，蓋君以己亥春返國，組正氣會於上海，假東文譯社之名，實以革命主義號召人心，結合有志之士。」見胡石庵：《烈士唐才常事略》，收於杜邁之輯：《自立會史料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頁203。

⁵³ 辛亭亭：《陳景韓「三重身分」解讀》（江蘇：蘇州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頁6-14。

景韓並非隨意抽取、恣意譯介小說，譯作各具「少年從軍」、「領袖風範」、「學生組織」等主題，正好呼應陳景韓的人生境遇。藉著譯介小說，陳景韓成全了生命中無法達成的心願，重拾破碎的從軍理想，仰望未結善緣的良師。

《少年軍》系列，原著出自日本作家德富蘆花、義國作家愛德蒙多和法國作家雨果的著作。雖來自不同時代、國家與作者，卻同以「少年從軍」為主軸。作品描述「少年」因為「從軍」而「成長」，在戰場發揮少年特有的熱血、衝勁，凸顯「少年軍」潛力。《少年軍（一）》描寫「少年成軍」的炙熱情懷，「少年救國」奮力迎戰的姿態。文本取自1893年，德富蘆花編輯《近世歐米歷史之片影》，其中一則短篇《少年軍（南北戰爭の花）》。⁵⁴ 故事持第一人稱，作者是「南部步兵學校學生」，記錄參與美國「南北戰爭」的過程。

故事敘述參戰少年皆為「余威尼亞兵學校之生徒也，余之同學皆南美之華族、之富豪、之少年也。」⁵⁵ 先行軍隊在征戰數月後，缺乏食糧而戰敗，生機渺茫，威尼亞兵學校校長約聖遂派遣少年援軍前進戰場，寄望「我一校之少年，盡化英雄飛去」。⁵⁶ 即便戰場告急，軍情不利，「少年軍」仍不減參戰的意願，請求父母讓他們離開家庭、學校，投身沙場：

十餘州中有一點戰心勃勃，如燃如沸者，僅一巢之雛鷹，其翼躍躍，僅一穴之乳虎，其聲嗚嗚，少年軍哉！少年軍哉！積一身之雄心奇憤，忍之為可忍，鬱之為可鬱，時為千八百六十四年，我所愛殺敬殺之一隊少年，乃忙忙碌碌，星夜致書，郵子父母保證人，乞退校從軍之令。⁵⁷

⁵⁴ 德富蘆花編：《少年軍（南北戰爭の花）》，《近世歐米歷史之片影》（東京：民友社，明治二十六年〔1893〕7月），頁125-141。

⁵⁵ 喋血生：《少年軍（一）》，《浙江潮（東京）》第1期，頁2。

⁵⁶ 喋血生：《少年軍（一）》，《浙江潮（東京）》第1期，頁3。

⁵⁷ 喋血生：《少年軍（一）》，《浙江潮（東京）》第1期，頁3。

「少年兵」皆來自顯赫「華族之富豪之少年」，小說以「一巢之雛鷹」、「一穴之乳虎」比喻年幼。雖是「雛鷹」卻「其翼躍躍」，企圖展翅鷹揚；雖是「乳虎」卻「其聲嗚嗚」，意欲騰躍長嘯。他們抒展累積的「一身之雄心奇憤」，伸張「忍之無可忍，鬱之無可鬱」之情致，離開養育他們的幼巢「學校」和「父母」，加入軍旅生活。反觀生於江蘇書香門第的陳景韓，學習古典文學，考取秀才，卻在1896年毅然捨棄學文，經鈕永建（1870-1965）介紹，就讀「湖北武備學堂」，為該學堂的首批學生。爾後，隨姊夫雷奮（1871-1919）至日本求學。他「棄文投戎」、「離開家鄉」的人生際遇，恰與「少年軍」裡的少年們相同，或許是譯介《少年軍（一）》的原因之一。

《少年軍（一）》刻劃「年少」離家、離校之情狀，形塑「少年」克服恐懼，獨立遠征的「成長」歷程，表達「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意志。小說積極描繪少年軍臨行時，步兵隊與砲兵隊訓練有素，慨然向戰場前進。但話鋒一轉，便以「余」的視角，泄露「少年兵」表面眾志成城，內心卻充滿擔憂和不安：

余當時之心臟，余當時之情形，雖舉數千百之詞章家，不足以形容之，余又喜，余又驚，余之心如波之湧，忽上忽下，余之顏如潮之流，忽冷忽熱，余不自知其何以然！余不自知其何以然！⁵⁸

文本運用「離別」，成就「從軍」、「成長」的壯烈，將主人翁們一一從「雛鷹」、「乳虎」的孱弱中抽離出來。短短一段描述離開校門、遠去從軍的文字，主人翁「余」竟然出現七次，一再提及「自我」的忐忑和惶惑。少年心情「忽上忽下」、身體「忽冷忽熱」，難以控制「余不知其何以然」。當少年軍經過「斯丹頓女學校」，和女友們訣別「多情叮囑，依依不捨」。⁵⁹少年們縱然表面從容，但此去

⁵⁸ 喋血生：《少年軍（一）》，《浙江潮（東京）》第1期，頁4。

⁵⁹ 喋血生：《少年軍（一）》，《浙江潮（東京）》第1期，頁4。

前途茫茫，面對離家遠行，心情不免波動。「余」一層層剝開少年的內心，描繪「自我」複雜的內心狀態。陳景韓譯介時投射過往的經驗，因為他也曾被迫拋下一切，離開家鄉、出走中國、流亡海外。筆墨動人心魂，將離人內心的忐忑，躍然紙上。

「少年軍」旅途中，雖然意氣勃發，愛國情盛，但總還是青春稚氣的孩子。活潑的「少年軍」言語時時表露對「成長」、「成熟」的急切、渴望。急於長大的他們，以「剪髮」作為儀式，象徵脫離「稚嫩」：

未幾而日出矣，少年軍復露餐而待戰，歡呼高唱，儼若尋常，有滑稽者，持指剪向吾儕曰：「為諸君剪去黃毛，免得夢中向保姆哺乳也！」且問曰：「諸君戰死，果何以為葬儀？願敵人為我經綫，敵人之土地為我棺槨，敵人之國門為我鏤紀念碑！」⁶⁰

〔日譯文〕

況して其の内の滑稽者が一個の剪刀持ち來りて我儕に向ひ「故郷へ送り玉ふ記念にイザ愛嬌毛切りてまいらせむ、討死し玉は、棺は何が御望なりや、紅木製の棺に緞子の裏附け、真鍮板の姓名年月美々しく鐫りたるが御好みならむ」⁶¹

〔筆者自譯〕

更進一步，他們中的一個令人發笑的人拿著一把剪子走過來，我們說：「割下一縷髮絲，當作遺物贈予故鄉。如果你陣亡的人，想用什麼做棺材、一口紅木的棺材，裡面鋪著絲絹。黃銅板上用優美的字體刻上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隨你喜好。

⁶⁰ 喋血生：《少年軍（一）》，《浙江潮（東京）》第1期，頁5。

⁶¹ 德富蘆花編：《少年軍（南北戰爭の花）》，《近世歐米歷史之片影》，頁499。

冷血版《少年軍（一）》裡展現「少年軍」意欲「成長」、「成熟」的心願，如此英勇、果斷的樣貌，正是「青春正盛」的最佳證明。藉由他們的聲口，表示厭棄「青澀」，拋除「軟弱」，轉為「強硬」的姿態。少年們刻意嘲笑「黃毛」形象、諷刺「向保姆呼乳」行為，全是日原著沒有的內容。喋血生的譯寫，添加了「嘲諷」的語氣，反而減少了原著「壯烈」的氣氛。這樣的譯介方式，顯現了冷血的熱切與急躁，期許中國少年跳脫「稚嫩」，加快「成熟」的心情。

然而，少年急切證明「成長」，出自於缺乏他者「肯定」。《少年軍》不僅處理「少年」角色，同時運用「長」、「幼」間的應對，凸顯雙方差異，使「長者」和「少年」互為「他者」，進行對話、辯證、比較。例如利用「少年」與「父親」的競逐關係，強化少年急於「成長」的毛躁。少年一面打仗殺敵、激烈對戰，一面在內心反駁「父親」稱其為「乳臭兒」、「畏縮鼠色」。於是「建功立業」，便成了少年「成長」的證明，超越「父親」的象徵。於是「戰場」遂成為少年們實踐「成長」之園地：

蓋余昔曾以從軍志願，強請于父，父曾嗤我為乳臭兒，臨陣必畏縮鼠瑟。余大惱之！然今日苟徒奉此不動尊，一矢不發，歸則我父將嘲笑我，我何忍！我何忍！⁶²

〔日譯文〕

諸君。敵、前=アリ。我同輩ハ今戰ハントス。余ガ後二八敵ヨリモ猶恐ルベキ敵アリ。家=婦ッテ、我一發ヲ放クズ、輜重ノ車ヲ護護リシト云ハバ、我父ハ嘲弄ノ矢ヲ以テ我ヲ射殺サン。⁶³

⁶² 喋血生：《少年軍（一）》，《浙江潮（東京）》第1期，頁6。

⁶³ 德富蘆花編：《少年軍（南北戰爭の花）》，《近世歐米歷史之片影》，頁500。

〔筆者自譯〕

先生們，敵人正在向我們襲來！我的戰友們現在沒有戰鬥。我身後有兩到八個敵人，但仍要害怕會有更多的敵人。我的妻子告訴我，保護運輸隊的車輛時，若我一槍不開，我的父親會用嘲諷的箭射死我。

喋血生一層層剝開少年參戰的心聲，從救國衛民、成長茁壯到證明自己，每一個層次都是少年「成長」的關卡。「少年軍」勇猛抗敵的原因，竟是為了反擊父親的恥笑和斥責，以證明自身能力。似於原著中，少年恐慌著自己若沒有「開槍」，回鄉便會面臨父親「如箭射死」一般的嘲諷。少年不願死於父親嘲諷的箭，戰死沙場便是最佳的選擇。冷血亦刪除了「妻子」的提醒之聲，「犧牲」的心態是出自少年本身。譯者喋血生選擇此般譯寫方式，與日本「祈戰死」精神一脈相承。對於原著裡父親用嘲諷之箭「射死」兒子的描寫，喋血生則處理得較為婉轉。

梁啟超、康有為（1858-1927）等人，曾深刻啟發了陳景韓，卻在「自立軍起義」時未伸出援手。對於「少年」陳景韓而言，曾決意就讀的「武備學堂」、誓死捍衛的「國家」都無法容身，憧憬的理想一一破碎。梁啟超還批評自己「實非吾黨」、「怪極」，⁶⁴ 抨擊所編《大陸報》「敷衍篇幅者居全冊之半，無甚精彩」。⁶⁵ 此後，陳、梁兩人便於報刊上爭執不斷，相互對立。⁶⁶ 《少年軍（一）》，故事表面訴說少年離開家庭、學校，捨棄男女私情，成就大愛。少年「參

⁶⁴ 梁啟超在豐陽館停留時，常和旅滬日人聚會，也與陳景韓、吳祿貞等人見面。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32、225。

⁶⁵ 梁啟超：〈學界時評：叢報之進步〉，《新民叢報》第26期（橫濱：新民叢報社，1903年），頁82。

⁶⁶ 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事長編1901.1-1903.12》第3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年），頁174。

戰」獲得肯定與「成長」，「戰爭」與「成長」密不可分，乃晚清戰爭敘事不斷縈繞的主題。然小說深層包藏了譯者的生命經歷、個性養成。陳景韓選擇譯介、刊登《少年軍》，不只為了激勵「中國少年」，同時也撫慰了當初的「少年陳景韓」。

《少年軍（二）》原著為義國作家愛德蒙多的《愛的教育》的一則日記《少年鼓手》。⁶⁷經由日人原抱一庵翻譯為日文版《伊国美談：十二健兒》其四〈少年使者〉。⁶⁸原抱一庵對於「少年」的重視也影響了陳景韓，流露出他對「少年」之期許。主人翁安利柯感嘆一名少年軍人，在義大利第一次獨立戰爭中犧牲生命。陳景韓在故事前急切呼籲：「容予宣告同胞」、「我同胞其投袂而起哉」，並指出「我同胞盍奉此短篇為好腳本也！」翻譯目的和預設讀者，清晰可見，全為激勵中國少年。小說凸顯「勇少年」勇往直前、奮不顧身的青年特質，正是「好腳本」。故事著重敘述一名「伊大利有一軍國民精神代表之十四齡勇少年」，⁶⁹隻身突圍，請求援兵，足以代表「軍國民精神」：

十四齡之勇少年，忽躍而前曰：「將軍能作乞援書否？」復出懷中麻繩一條以相示。噫胡為乎？四顧狼虎，圍我且銅牆鐵壁，誰作遞信鳩？沖霄傳去，將軍未免詫異，遲遲不能決，少年叱曰：「將軍何俟？盍草衍數行字，願以予頑冥之質，為眾生請命！」⁷⁰

勇少年年輕氣盛，銳不可擋，主動向老將軍請命，願冒著生命危險，

⁶⁷ 本文使用《愛的教育》義文版為Edmondo De Amicis, *Cuore* (New York: H. Holt, 1896) 參照之中譯版本則是Edmondo De Amicis著，蕭天助譯：《愛的教育：世界文學名著》（臺中：曾文出版社，1975年）。

⁶⁸ エドモンドデ、アミチス著，原抱一庵譯：《伊国美談：十二健兒》（東京：内外出版協會，明治三十五年〔1902〕5月），頁43-64。

⁶⁹ 喋血生：《少年軍（二）》，《浙江潮（東京）》第7期（1903年），頁11-12。

⁷⁰ 喋血生：《少年軍（三）》，《浙江潮（東京）》第9期（1903年），頁1。

向外請求增援。對比「老」將軍「遲遲不能決」，猶豫又躊躇的態度，十四歲的勇少年果斷、激進，發下「為眾生請命」豪語，盡顯「勇少年」的優點。他代表的「軍國民精神」乃自日本翻譯時增加而來，將原著《愛的世界》兒童教育性質增添了「軍事」元素。

自信堅毅、身手靈活的勇少年，用幼小纖細的身體，矯捷地穿越層層圍困，從容穿梭在「狼虎圍我」、「銅牆鐵壁」的細縫與破口間，順利拯救同胞。小說轉以長者「老」將軍的視角，細緻描述勇少年突圍的行跡：

將軍曰：「圍中之生活，懸於爾之健足及爾之勇氣，爾慎行！」少年試行數步曰：「信予如斯，乃飛奔危坡而去。」……勇少年，行漸遠，形漸小，幾不可見。繼以望遠鏡，轉瞬鎗彈如飛電，奔向少年落咄，何事咄，我最希望最勇猛之少年，已被山外奧國偵探兵所見，危！危！！惟見勇少年，忽伸忽伏，行愈疾，忽焉仆矣。將軍急自槌胸曰：「傷！負傷！！」言未畢，少年已起，將軍點首曰：「神！！」在爾之上，未幾少年已潛入森林，復遶出，惟行愈遠……。⁷¹

老將軍戴著望遠鏡觀望勇少年，讀者彷彿也隨著他的目光，親眼看見十四歲的勇少年，奔跑在山林之中。他穿梭在「鎗彈如飛電」的山坡地，纖細幼小的肩膀，擔起全隊的希望，肩負全營將士的生命，及義大利整個「國家」的寄託。老將軍看著少年穿越槍林彈雨，卻不幸被子彈擊倒，負傷又再度起身，身形越來越小，越行越遠。以老將軍的口吻，訴說勇少年的行徑，敘事流暢、精彩，情感豐厚，畫面感鮮明，宛若身歷其境。

勇少年堅持不懈，勇往直前的身影，代表著義大利的希望與未來，可謂「少年」的命運便是「國家」的未來。他的堅毅和犧牲，提

⁷¹ 喋血生：《少年軍（二）》，《浙江潮（東京）》第7期，頁14。

供中國少年們一個絕佳楷模，學習「軍國民精神」的榜樣。正所謂：

少年強則國強，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於地球。⁷²

梁啟超認為近代中國的「少年」，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而是隱喻國家整體的狀態，整個中國民族的未來。梁啟超與陳景韓便宛如《少年軍（二）》中的「老將軍」與「勇少年」，一個躊躇不進，一個勇往直前，大相逕庭，終將分歧。「老將軍」和「勇少年」處事的態度，反映了「老大帝國」與「少年中國」的差異，投射晚清當時受困於「返老還童」的蛻變焦慮裡，呼應了彼時「保守／革新」的世代對峙。

同樣地，《少年軍（三）》也出現「老大」、「少年」角色，彰顯陳景韓心中「理想領袖」形象。原抱一庵日譯本《ABC組合》乃抽取《悲慘世界》關於少年革命的片段，並加以拼貼、重整。《少年軍（三）》乃日譯本《ABC組合》第一回〈紅色旗〉，⁷³ 對照原著為第4卷〈絕望的壯舉〉。⁷⁴ 故事書寫「學生組織」秘密從事法國革命，陳景韓強調小說裡：「無貴無賤，無老無少，無男無女，靡不含有革命思想。」⁷⁵ 向中國讀者、男女老幼，疾呼革命思維。小說描寫戰場上的法國軍旗被敵軍打落，八十九歲的老叟馬畢（père Mabeuf），捨命拾回軍旗，並鼓勵六十九位少年軍爭取「自由！平等！不然死！」：⁷⁶

⁷²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梁啟超全集》第1冊，頁406。

⁷³ ウクトル・ユゴー原著，原抱一庵譯：《ABC組合》（東京：内外出版協會，明治三十五年〔1902〕），頁1-12。

⁷⁴ 本文使用《悲慘世界》法文版為Victor Hugo, *Les misérabl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64). 參照中譯版本則是Victor Hugo著，李玉民譯：《悲慘世界》（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20年）。

⁷⁵ 喋血生：《少年軍（三）》，《浙江潮（東京）》第9期，頁1。

⁷⁶ 喋血生：《少年軍（三）》，《浙江潮（東京）》第9期，頁1。

時則馬畢已拾起墜下之血旂，捧立於紅雨珠跳中，而六十九人之少年軍，愈不敢不奮，愈不敢不勵。馬畢復曰：「非示吾威於敵，不足於警吾，今升堡壘絕頂，使吾血旂獨表於世界之上，乃梯而登，嗚呼敵軍！嗚呼少年！」其亦見恍惚，類自由神銅像之老壯士，敬煞愛煞，我少年六十九人施禮，脫帽施禮。⁷⁷

〔法文中譯〕

這個八十歲老人，從安灼手中奪過紅旗，他腦袋不住抖動，腳步卻很堅定，沿石級緩慢地登上街壘，場面十分悲壯，周圍的人誰也沒敢上前阻攔，也沒敢上前攙扶，都紛紛沖他喊：脫帽致敬！⁷⁸

〔日譯文〕

一步一步，一階段又一階段。折から誰の口よりともなく、一道の叫聲起れり『脱帽！』『脱帽！』六十九士は威な嚴かに帽を脱して、マビーの階を登るを仰ぎ望めり。⁷⁹

〔筆者自譯〕

一步步走上階梯，不知從誰口中喊出：「脫帽！脫帽！」六十九位勇士莊嚴地摘下帽子，登上馬畢之梯，抬頭眺望遠方。

老壯士馬畢，奮不顧身，在「紅雨珠跳中」拾立血旂，令人動容，向法國少年軍做出了最好的榜樣。⁸⁰但原著與日譯本皆未凸顯

⁷⁷ 喋血生：《少年軍（三）》，《浙江潮（東京）》第9期，頁2-3。

⁷⁸ Victor Hugo著，李玉民譯：《悲慘世界》下冊，頁1239。

⁷⁹ ウクトル・ユーゴー原著，原抱一庵譯：《ABC組合》，頁6-7。

⁸⁰ 老叟馬畢在原著《悲慘世界》為一個充滿愛心、喜歡讀書、熱衷植栽，卻對政治不關心（甚至反感）的神父。在法國政府的統治下，他的財富、書、植物逐漸化為烏有，打破了內心的平靜，決意加入反抗的行列而犧牲

「少年」的主題，也沒有陳述馬畢「示吾威於敵，不足於警吾」的警眾決心。陳景韓在小說後評述：「諸君聽哉！馬畢是長老，而與少年之模型也！」⁸¹可見陳景韓對於「警眾」的重視，對「老者」做為「少年」優秀榜樣的敬重。「老大」和「少年」的國族隱喻又再次出現，這次身為「老大」的馬畢，以身作則，將「典範」或「規範」深深地烙印在「少年兵」心上。反觀陳景韓自與梁啟超等人分道揚鑣後，深刻烙印在他心中的，便是「革命」一途。他為逃避清朝通緝，動身前去日本，追隨孫中山（1866-1925），並名列「興中會後期的革命同志」。⁸²相較於梁啟超的保守、躊躇，孫文正如《少年軍（三）》獻身革命、以身作則的老馬畢，與陳景韓的理念一拍即合。可知「少年軍」主題，雖符合晚清環境而譯，但對於陳景韓個人而言，譯介《少年軍》系列小說並非隨機取樣，乃隱含著難忘的人生經驗。

《少年軍》系列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讀者「少年」成為「少年軍」的心路歷程，他們越過層層困難與考驗，最終「成長」。少年因為救國，離開熟悉的家庭、學校及戀人。在長輩的期許、斥責等壓力中，藉由「參戰」展翅鷹揚。戰場上的勇少年，穿越鎗林彈雨，閃避敵軍埋伏，即便負傷仍舊前進，足以擔負國家重任。縱使「英雄出少年」，理想少年仍譯自「他國」，「中國少年軍」仍處羽翼未豐、創業未成的階段。但「少年軍」積極、靈敏，不計利益的特質，象徵了陳景韓所希望的未來，總有一天中國將重新站上世界的頂端。

生命。馬畢是一個尋常百姓（或知識分子）的原形，從獨善其身到不得不正視國家社會的問題而反抗，凸顯了《悲慘世界》「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沉重意義。原抱一庵的日譯本，僅抽取「ABC之友」的部分，並未特別著墨馬畢角色的變化，導致中譯者陳景韓亦未曾關注這個人物的特殊性。

⁸¹ 喋血生：《少年軍（三）》，《浙江潮（東京）》第9期，頁3。

⁸² 彼時日本興中會、同盟會，將陳景韓與雷奮列入「興中會後期的革命同志」名錄，陳景韓因此結識了不少同伴，如狄楚卿（1873-1941），奠定往後發展刊物之人脈資源。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656。

四、建構「義勇軍」：

《義勇軍》小說／教戰的並行與交疊

本節將討論原著為莫泊桑的《俘虜》，由日人橋本青雨譯為《義勇軍》，中譯本承襲日譯本之譯名。《義勇軍》與《少年軍》系列小說不同，《少年軍》系列表彰「少年」成長、從軍的重要；《義勇軍》則從中譯本的改寫，窺知「軍事」元素的逐步拓深，挖掘「少年從軍後」所受的教育內容。筆者將觀察晚清譯介行為，探究晚清譯者翻譯、改寫小說背後有何翻譯策略與書寫目的？故事主角「義勇軍」為何從「戲謔」、「業餘」性質，譯介為「專業化」、「軍事化」形象？小說如何由「文學」性質，調整為「應用實戰」的「教戰講義」？

晚清無論是維新派、革命黨，為力求救國、起義革命，皆支持「軍國民主義」、「全民皆兵」。1895年，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呼籲改制：「今環地球五十餘國，而泰西爭雄，皆以民為兵，大國練兵至百餘萬」。⁸³ 相關最著名的論述，乃1900年至1904年間，蔡鍔（1882-1916）以筆名「奮翮生」，於《新民叢報》連載《軍國民篇》。他提出效法希臘斯巴達的「軍國民主義」，並從教育、文學、風俗、武器等方向，思考改革方針。政府因此設立「軍事學堂」、「武備學堂」，如天津水師學堂、江南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要求人民盡服兵役的義務。⁸⁴ 民間亦紛紛組織「軍事體育會」，一方面沿襲傳統武術教育，一方面借鏡西方體育形式，培養體能、軍事的能力。⁸⁵ 《俘虜》亦由法國至日本為《義勇軍》，再譯入中國，傳播

⁸³ 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收於馬洪林、盧正言編注：《康有為集（政論卷）》上冊（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頁70。

⁸⁴ 吳洪成：《中國近代教育思潮新論》（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6年），頁92。

⁸⁵ 張曉軍：《近代國人對西方體育認識的嬗變1840-1937》（長春：東北師

「軍國主義」、「全民皆兵」的理念。

莫泊桑原著《俘虜》，講述法國郊外的護林人家庭，僅有老父、老母與女兒三人在家，女婿則長年在外行軍。某日老父外出，德軍突然敲門索食，女兒用計將德軍囚於地窖，並連繫城內民兵團救援，最後德軍被俘虜進城。小說以活潑生動的文句，撰寫女兒的機智、德軍的狡詐，及法國民兵團的戲謔。雙方攻堅過程錯誤百出，諷刺滑稽，胖民兵因貪玩而受傷，引得眾人大笑。民兵團對待戰事宛如遊戲，卻荒謬地贏得了勝利。⁸⁶ 西方涉及「戰爭」並以「女性」為主的小說並不多見，莫泊桑取小說名為「俘虜」即是提問：「究竟俘虜是誰？」塑造「女兒」的智慧機警，顛覆「男強女弱」既定印象，譏諷意味濃厚。

《俘虜》經日譯者橋本青雨改名為《義勇軍》，內容因此偏向政治與教化。從原著至日譯本的變動非本章論述要點，此處僅提出幾點重要差異，餘不贅述。其一，更動小說題名為「義勇軍」，凸顯原作與譯作意識形態的差距，原著描繪民兵團羈押德軍，歡欣鼓舞地呼喊「hurrah」，日譯本全數譯為讚嘆天皇的「萬歲（ばんざい）」，政治意圖昭然若揭。其二，故事焦點從「女兒」改成「民兵團」，大幅刪除民兵團幼稚荒唐的舉止，賦予其保家衛民的形象。在橋本青雨筆下，躁進且粗俗的民兵團，搖身一變為愛國志士。其三，原著胖民兵因為貪玩、躁進，導致中槍受傷，日譯本更改其為攻擊德軍而負傷。《俘虜》「形變」為《義勇軍》，中國譯者以《義勇軍》為底本翻譯，大多受到日版本的影響。

中譯本《義勇軍》名稱沿襲日譯本，依序譯為三種中譯版本：1904年，登於《新新小說》的冷血版；1905年《大陸》版；1909年，刊登於《南洋兵事雜誌》，由楊與齡譯寫的楊與齡版。冷血版和《大

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71-182。

⁸⁶ 本文所參照之《俘虜》中譯本為莫泊桑著，張波譯：《俘虜》，《莫泊桑短篇小說選》（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頁284-295。

陸版》大多依照日譯本翻譯，僅有些許形式異動和風格差異。⁸⁷ 然而，1909年《南洋兵事雜誌》刊登「作者」為楊與齡的「步兵戰鬪」《義勇軍》，便顯見相當差異。楊與齡生平資料不多，筆者於《鎮江文史資料》，見子姪輩許圖南著有〈老畫師楊太晚先生〉一文，記載其生平事蹟。楊與齡為安徽人，曾中秀才，因清廷腐敗而放棄科舉，後恣情繪畫、書法，書畫作品頗豐。⁸⁸ 他常在《南洋兵事雜誌》發表，民國後於《憲兵雜誌》刊登議論文，皆與軍事、戰事有關。《南洋兵事雜誌》第41期，刊有楊與齡詩作〈歲暮從軍〉：「十載沙場，白髮催拋」，⁸⁹ 可知其從軍歲月漫長。他曾任教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兵學」、「兵操」等課程。從其「兵學」課程大綱：「以戰爭之經驗，證之日本坂田虎之助、天野平八二氏口授之世界戰史，及現歐西戰事種種之設備，和基本、應用兩種戰術編成講義，期發揚學者之神智，而導入尚武之途。」可知楊與齡確實參與過戰爭，對各國戰史熟稔，將經驗編為「教學講義」，期許軍事教育能發揮作用。

不僅如此，觀察楊與齡「兵學」課程內容：軍紀風紀、陸軍編

⁸⁷ 整體而言，冷血版與《大陸》版與日譯版的內容、走向並無太大差異，唯有譯者風格的差別。冷血所譯版本承襲原本的日譯版語句，內容也依照日譯本，但仍見些許異動，如冷血添註《義勇軍》為「戰爭小說」，並將日譯本劃分的四個小節更動為五個小節，翻譯語言採用半文言，詞語精煉。

《大陸》版情節大致與冷血版相同，但增加冷血版所沒有的日譯版內容，故推測《大陸》版以日譯版為底本進行翻譯。《大陸》版取消了日譯本、冷血版的章回，並刪除許多細緻的描述，篇幅較為短小。《大陸》版未標明譯者，其使用文言語體，用詞古典，敘事雅潔，節奏明快，壟罩濃厚的古典文學氛圍。見毛白石氏著，冷血譯：《義勇軍》，《新新小說》第1卷第2期（1904年），頁1-12；佚名：《義勇軍》，《大陸報》第3卷第4、5期（上海：大陸報總發行所，1905年），頁10-14、1-7。

⁸⁸ 許圖南：〈老畫師楊太晚先生〉，李植中、馮鳴儀主編：《鎮江文史資料》第17輯（鎮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鎮江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0年），頁144-146。

⁸⁹ 楊與齡：〈歲暮從軍〉，《南洋軍事雜誌》第41期（南京：兵事雜誌社編輯，1909年），頁1。

制、步兵隊形、行軍、宿營、舍營、露營、彈藥補充、補助搜索、行李、衛生隊、紅十字會繃帶及擔架法、處置傷者等應有盡有。⁹⁰「兵操」課程內容：徒手教練、持槍教練、各類射擊法、裝退子彈、追擊衝鋒、戰鬥實施、傳達命令等包羅萬象。⁹¹ 楊與齡的戰爭知識廣博，經歷豐富，並致力於軍事教學。1919年《兵事雜誌》一月二十二日刊有〈大總統令〉：「參謀總長張懷芝呈請任命楊與齡為陸軍第十九師二等參謀官。」⁹² 得知楊與齡軍事事業順遂，獲參謀官職。從楊與齡的生平出發，觀察其何以大幅改動《義勇軍》的內容，便可得到十分明確的答案。

小說大力強調「軍事訓練」與「戰事攻防」的「教戰」性質。首先，譯者全數刪除「女兒」角色，將相應的人物行為移至男性主角「竹伯」。楊與齡選擇強化了「竹柏」這個男性角色，精明幹練，宛如楊與齡本人。再者，就小說形式而論，楊與齡將故事分為六個小節，並以「戰爭步驟」為小節標題：「蔡村之驚報」、「普兵之露營」、「義勇軍之組織」、「我軍之夜襲」、「普兵之潰敗」、「義勇軍之講評及凱旋」。楊與齡版《義勇軍》，搖身一變為完整的「教戰守則」，軍隊遵循的專業「作戰程序」。最後，楊與齡增加了原著、所有譯本未出現的「戰事步驟」、「著者曰」，評議戰略優缺，儼然就是軍事教學課程「講義」。

楊與齡版《義勇軍》細緻、全面地描述軍事策略和戰地攻防，全然開拓了清末另一種翻譯特色和選擇：小說向「教戰守則」靠近。面對《南洋兵事雜誌》的軍事專業讀者（多是接受軍事訓練的學員），楊與齡的《義勇軍》是「教戰」、「實戰」的模板。在讀者腦海刻劃軍人勇猛、戰爭險惡，治兵效率極高、軍紀甚嚴的深刻印象。情節以

⁹⁰ 潘懋元、劉海峰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741-742。

⁹¹ 潘懋元、劉海峰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高等教育）》，頁744。

⁹² 〈大總統令〉，《兵事雜誌》第58期（杭州：浙江兵事雜誌社編輯，1919年1月22日），頁11。

「男性」為軸心：

村中一老者，年六十至七十，面貌飽經閱歷，步輕如猿，骨瘦如仙，臉上皺痕如篆文，且和藹且慈善，令人一見不覺生出一種可愛可敬又可畏之心，村中無論老少，呼其名曰『竹伯』。⁹³

故事的主角竹伯，乃經歷豐富的「耆老」，「飽經閱歷，步輕如猿，骨瘦如仙」，讓人敬畏。當他遇見兇猛的德軍「有普兵六人，黃鬚、倒捲，高鼻凹目」，⁹⁴ 立即改操德語，態度「柔弱、溫順、服從」，姿態「如小學童子，養其師之鼻息，十分可憐」。⁹⁵

「竹伯」除了取代「女兒」的功能，他本身「飽經閱歷，步輕如猿，骨瘦如仙」的模樣，也深有意涵。楊與齡形塑一個聰慧的「老者」竹伯，吻合中國傳統文學中的「隱者」、「求道老者」、「仙翁」形象，如唐代柳宗元（773-819）描繪：「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⁹⁶ 顯現老者孤獨、隱逸，與世隔離、抵抗時局的形象；清代楊鳳輝（生卒年不明）《南皋筆記·柳異記》蒐錄民俗傳奇，篇中所描寫的柳精形貌亦是老者：「忽有一老者，修髯瘦骨，鶴髮童顏，自樹中出……。」⁹⁷ 可知，「老者」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具有神妙、出塵、聰穎等意象。同時，中國道教也賦予「老者」傳奇的表象，時常與「稚兒」、「嬰兒」形象相連，表彰「老而不死」、「返老還童」的道法修為。⁹⁸ 有意思的是，「竹伯」老邁且靈活，聰敏宛若「小學

⁹³ 楊與齡：《義勇軍》，《南洋軍事雜誌》第34期（1909年），頁1。

⁹⁴ 楊與齡：《義勇軍》，《南洋軍事雜誌》第34期，頁2。

⁹⁵ 楊與齡：《義勇軍》，《南洋軍事雜誌》第34期，頁2。

⁹⁶ 柳宗元著，王國安箋釋：〈江雪〉，《柳宗元詩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268-269。

⁹⁷ 楊鳳輝：〈柳異記〉，收於《南皋筆記》上（上海：上海進步書局，1912年），卷1，頁1-2。

⁹⁸ 三浦國雄著，王標譯：〈道教中的老翁與嬰兒——時間的潮流〉，《不老不死的欲求：三浦國雄道教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童子」的行徑，正與道教「仙翁／童子」的精義相輔相成。

看似普通百姓的竹伯，事實上與傳統「隱者」、「求道老者」、「仙翁」同樣深藏不露，只是不再象徵「隱逸」、「神妙」，而是凸顯「軍事諜報」的功能。竹伯真實身分為「義勇軍前哨特別通信員」，家中「特設一秘密電話」，床榻藏有隱密的「機關室」，⁹⁹機動性極高，尤其專業。他通知瑪荳堡軍隊前來救援後，小說的重點轉為聚焦在軍隊行動，闡述軍事指揮、電信通訊之步驟：

長官乘高頭大馬，足踏長靴，炯炯眼光，射人肺腑，聞普兵報告畢略，一點首，揮其部下出村外，選定村之左側相隔約一百密達，為本日之宿營地……。普軍雖未恐嚇土民，及押人質為實之事，然防禦極嚴，由藜村達他處之電桿，一律砍斷，凡與十字路口，特設閉塞物及衛兵，村中之土民概行禁足，准在村內運動，不得他出。¹⁰⁰

長官面容英姿煥發，眼神有光，決斷有力，先判斷在村莊左側「一百密達」處「駐紮」，再下令砍斷村莊周邊的電桿，「封鎖」村莊對外消息，並嚴禁村民進出。小說講述「就戰步驟」嚴謹、果斷又專業，與先前任何譯本的內容大相逕庭。義勇軍不再是「業餘」的、民兵性質的，或頻繁失誤的；對戰的敵軍也不是疲憊飢餓、鬆於防範。楊與齡的《義勇軍》，戰情「升溫」，戰況「升級」，將兩軍對峙、對戰時，紮營防守、封鎖消息、設置路障、特設衛兵等細節具體呈現。《義勇軍》便是楊與齡的教戰課本、課程講義，戰場實際狀況，無一不寫、無所不包。

楊與齡特地標明小說為「步兵戰鬥」，講解義勇軍們如何反「守」為「攻」，從紮營、留守、封鎖，到電力、通訊、報密等，戰略無不

頁407-418。

⁹⁹ 楊與齡：《義勇軍》，《南洋軍事雜誌》第34期，頁4。

¹⁰⁰ 楊與齡：《義勇軍》，《南洋軍事雜誌》第34期，頁3。

詳盡。楊與齡仔細講述戰爭步驟，藉由故事教育讀者，成就未來軍人之應戰能力。為了讓讀者增強「戰爭實感」，他生動描繪了兩兵相接的激烈狀況：

鏖戰垂入八小時，天初拂曉，戰霧如雲，普兵火力稍減，我方以最猛烈之擊，如萬雷齊發，震得耳為之聾，目為之眩，瞄準送彈一如尋常之操演，試問兩軍士兵有何深仇宿恨？不過拚著七呎微軀，兀立於硝煙彈雨之中，為國家的權力爭，盡那國民應盡的義務罷了！¹⁰¹

兩軍交戰八小時，戰況激烈，砲聲轟轟宛如「萬雷齊發」，震耳欲聾。義勇軍們「瞄準送彈一如尋常之操演」，說明平日便時刻警醒、日日操練，不曾懈怠。然而，在此危難緊急之時，楊與齡卻提出一個有意思的疑問：「兩軍士兵有何深仇宿恨？」這或許是身為「軍人」，心裡無法明講的共同疑問。究竟宣揚、執行「殺戮」的合理性究竟為何？他的答案是：「為國家的權力爭，盡那國民應盡的義務」。

當「國家」、「國民」的概念進入晚清，梁啟超提出：「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¹⁰² 國民與國家榮辱與共，唯有將百姓重塑為「國民」、「新民」，「中國」才得以成為「國家」。晚清居於「改造人做為改造一切的基礎」的立場，蔡元培（1868-1940）、孫中山（1866-1925）等人相繼提出「軍國民」論述，¹⁰³ 「國家」、「國民」密不可分。「殺戮」並非單就個人恩怨，而是「為國家爭」、

¹⁰¹ 楊與齡：《義勇軍》，《南洋軍事雜誌》第34期，頁5。

¹⁰² 梁啟超：〈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309。

¹⁰³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頁45-57。

「盡國民義務」。國家的地位推崇至高，即便兩國的軍人、百姓，並無深仇大恨，但只要牽扯國家利益，軍人為國犧牲，百姓奉獻生命，都是國民的「應盡義務」。

在楊與齡心中，「國家」、「國民」、「國軍」三位一體。相比前述兩種中譯本，楊與齡《義勇軍》的敘事意旨更傾向「官方」、「軍方」，用詞也更為嚴肅、專業。為強調軍人盡國民「應盡義務」，縱使傷亡無數，血流成河，亦在所不惜。如此慘況「白兵相接，起激烈之短兵站，一時平野死傷者之血染枯草上，咸成赭色。」¹⁰⁴ 楊與齡筆下一律詮釋為「奮勇」、「躍進」的偉大胸懷「我軍奮勇進攻，遂於高呼萬歲聲中，逐敵軍於戰場之外。」¹⁰⁵ 楊與齡《義勇軍》將備戰過程及哀鴻遍野的戰爭場景，「英雄式」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原著中胖民兵因貪愛嬉鬧，導致大腿中彈的情節，到楊與齡筆下卻遭刪除與改寫：

歸隊、檢查、報告人數，我軍僅傷二三十人，然皆可以無死，老者命至藜村取布來，裂之親裹其創，中有數人傷最劇，槍彈貫穿大腿，怒目磨牙欲食敵肉而甘心者。捕虜中死者掩埋之，傷者看護之，掠獲棄戰利品槍數十隻、乾糧、麥麵、子彈、革囊、水桶、外套、帳幕，以及各種應用材料，不可勝計，於是戰傷之灑掃畢。¹⁰⁶

[法文中譯]

每一分鐘就有了一個人從這邊迅速跑到那邊，就像孩子們玩的棒球運動，並且當他們跑的時候，腳後跟還踢起很多雪。……有人叫道：「輪到你了，馬洛瓦松。」馬洛瓦松是一個發福的麵包師，他肥胖的身體成了同伴中的笑話。……他打定主意，就

¹⁰⁴ 楊與齡：《義勇軍》，《南洋軍事雜誌》第34期，頁5-6。

¹⁰⁵ 楊與齡：《義勇軍》，《南洋軍事雜誌》第34期，頁5-6。

¹⁰⁶ 楊與齡：《義勇軍》，《南洋軍事雜誌》第34期，頁6。

邁著小步，像鴨子一樣搖搖擺擺地出發了，這讓他的肚子搖晃著，他們全都笑出眼淚來。……接著是一聲響亮的槍聲，然後這個胖麵包師發出一聲嚇人的尖叫聲就面朝地倒下了。¹⁰⁷

〔日譯文〕

「誰も居ない！」と一人が叫ぶ。すると一人が復た窓の前を駈けて通る。真の遊戯に成つて了つた。一隊から一隊と時々刻々一人宛走る様子が、宛然小兒の戰爭遊戯をしてゐるやう。……「さあ麻呂阿、君の番だぜ。」と誰かいいふ。麻呂阿はてつぶり太つた麵麥焼職人で、其のビル樽然たる腹が戰友の冗談の的となつて居る大男。……突然窖の窓からはつと紅い焰がさす、と、一發どんと響いて、麻呂阿は一聲怖ろしく叫ぶと諸共、俯向に倒れた。¹⁰⁸

〔筆者自譯〕

「這裡沒有人！」其中一個人喊道。然後又一個人跑過窗戶。這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遊戲。從這一刻到下一刻，人不停的走過，就像進行著小男孩的戰爭遊戲。……「來吧，馬呂阿，該你了」有人說。他是個大個子麵包師，他的大肚子是戰友們愛開玩笑的對象。……忽然，窖中的窗口竄出鮮紅的火焰一聲巨響，馬呂阿發出恐怖的叫聲，同時整個人向前倒了下去。

胖民兵負傷的情節，在楊與齡版僅簡單說明「槍彈貫穿大腿」，並賦予民兵「怒目磨牙欲食敵肉」的勇猛氣質，遂草草作結。楊與齡刪改的原因，正是因軍人、兵學教師的身分，及編寫「教育講義」的教育初衷。所以《義勇軍》不只是小說，更是代表「軍方」的「樣

¹⁰⁷ 莫泊桑著，張波譯：《俘虜》，《莫泊桑短篇小說選》，頁293-294。

¹⁰⁸ モーパッサン著，橋本青雨譯：《義勇軍》，《太陽》第10卷第13號，頁113-114。

板」，培養「專業」軍人的「教材」。楊與齡撰寫「歸隊」、「檢查」、「報告人數」每個步驟，交代死者「掩埋」，傷者「看護」的處理應對，且細緻點收戰利品「槍」、「乾糧」、「麥麵」、「子彈」、「革囊」、「水桶」、「外套」、「帳幕」。楊與齡版《義勇軍》是小說，同時流露了「軍事教育」的熱情，對「軍事人才」的重視。

楊與齡對於「戰爭」充滿熱情與想法，還不忘在故事尾聲進行戰事檢討，評估敵軍弱點「在我軍之右翼」，我軍必須「以主力聚於敵之弱點」方能致勝，並點出戰勝要點：

平時操練的勤惰，打靶的研究，機械的利鈍，心思材力的愚敏，暗中早已分出勝負，並非戰時所可強求者也。¹⁰⁹

反覆叮嚀讀者，戰前需勤奮的操演，才能獲得致勝先機。故事最終，他以「著者曰」再三提醒讀者注意：

普魯士宿營之疏忽，吾輩一般軍人當慎之。竹伯老者之機謀當師之，雅美路知磊落，及戰捷當敬之。義勇軍之愛國當思之慕之，而又酒菓香花以崇拜之。¹¹⁰

小說預設讀者是軍事學堂的學員，所以楊與齡不斷強調軍事戰略、忠貞愛國的重要。他增添小說「專業」、「謹慎」、「精確」的立場，呈現攻城掠地的「戰爭戰略」。

荒謬的是，中譯版《義勇軍》與莫泊桑《俘虜》早已天差地別，諷刺幽默的《俘虜》，經歷譯介行旅，成為英勇、強悍的《義勇軍》。楊與齡大幅改寫，成為軍事學堂的閱讀物，軍人的「教戰守則」，聚焦「強化軍備」、「教化培育」。《義勇軍》的譯介過程反映近代中國建立「軍事專業」的渴望，亦代表著晚清戰爭小說譯介趨向。

¹⁰⁹ 楊與齡：《義勇軍》，《南洋軍事雜誌》第34期，頁6-7。

¹¹⁰ 楊與齡：《義勇軍》，《南洋軍事雜誌》第34期，頁7。

五、征人苦旅：《枕戈記》之文學審美與人道反思

晚清報刊雜誌多以「維新」、「改革」和「啟蒙」為辦刊出發點。1902年，梁啟超《新小說》開宗明義：「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¹¹¹「小說」承擔改革政治、啟蒙民智的責任，如《少年軍》、《義勇軍》著力構築「少年成軍」或「全民皆軍」，正是循此風潮。然而，晚清仍有少數作家、譯者，選擇開創不同的道路，講究文學藝術和哲理省思。1904年發行的《教育世界》便憑著特殊的文學審美與哲學思維，占據承先啟後的重要位置。

1905年，刊登於《教育世界》的《枕戈記》，原作者為托爾斯泰。他於1851年前往高加索參戰，並創作了原著《伐林》。1904年，《伐林》由二葉亭四迷翻譯成日文版《つゝを枕》，¹¹²翻譯忠實移植了托爾斯泰的精義。¹¹³1905年傳至中國，為江蘇師範學堂和文課本。同年經王國維翻譯、潤飾而成「軍事小說」《枕戈記》。《枕戈記》擺脫了當時文壇熱衷的維新、革命、救國等命題，也無任何軍事指導、教化民眾等激情呼籲。王國維不輕易被晚清的政治意識、戰爭

¹¹¹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橫濱：新小說社，1902年），頁8。

¹¹² レフ・トウストイ著，二葉亭譯：《つゝを枕：軍事小説》（東京：金港堂，1904年7月）。

¹¹³ 二葉亭四迷認為每位原著者皆擁有屬於自己獨特的風格、語調，所以譯者必須學習各作者的詩歌思想、文學形式，並將其忠實地「移植」至譯本上。木村彰一分析比對二葉亭四迷的譯作「幾乎忠實地令人詫異」。見二葉亭四迷：〈余が翻訳の標準〉，十川信介、安井亮平編輯：《二葉亭四迷全集》第4卷（東京：筑摩書房，1984年），頁166-170；木村彰一：〈二葉亭のツルゲーネフものの翻訳について〉，《文学》第24卷5號（1956年），頁41-49。樽本照雄比對中譯本的誤譯、省略、差異處，如：中譯本地理知識的不足，使得翻譯駐軍地點「采奇納」翻譯有誤；以及中譯本將「骨牌遊戲」省略，僅翻譯為「夫伊利喀（謂昔日一狡猾兵故事）」；韋連邱克當兵十六年，中譯本誤翻三十年等。見樽本照雄：〈トルストイ最初の漢訳小説——「枕戈記」について〉，《大阪経大論集》第50卷第6号（通卷254号）（2000年3月），頁383-394。

意義收編，縱使曲高和寡，仍決意動筆譯介、刊登出版，超越當時的譯介高度。本節將探討王國維如何／為何譯介《枕戈記》？《枕戈記》的文字表現與藝術風格有何特色？其透露了何種戰爭景況與征人情懷？

王國維在日留學期間廣泛吸取西方哲學，受到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席勒（Egon Schiele, 1890-1918）等影響，¹¹⁴認為「美之為物，不關於吾人之利害也。吾人觀美時，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¹¹⁵ 王國維的文學思想，與彼時「救亡圖存」現實需求不同。他「無功利性」的美學哲思，發揮在創作、譯作與辦刊上。他追求文學「無絲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觀物也，不視為與我有關係之物」，享受物／我相互凝視、交融的寧靜狀態。又須達到「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於美術中則吾人樂而觀之」的共感通融。¹¹⁶ 受到各種文學情懷與精神哲思的滋養，使王國維的文學創作、翻譯表現，豐富多元。王國維譯介的《枕戈記》卓然鶴立，和晚清其餘宣導從軍、軍事教育、尚武精神的主流價值殊異。他選擇翻譯淒楚、無奈的《枕戈記》，正是實踐了內心價值。

《枕戈記》呈現托爾斯泰早期創作的特質，充滿內心呢喃與精神批判，筆觸細膩且富含情致，文學性極高。小說以一名炮兵的視角，描述連上成員的一舉一動。該連隊於「一千八百五十幾年之冬」，駐

¹¹⁴ 曾守仁認為王國維受諸多西方哲人影響，激發關於慾望、死亡、生命的「悲劇」思考，並反映在其創作、評論之上。所以王國維對文學的思考，同時融合了西方物質、器用與精神、心力，遂能擁有與時不同的眼光境界。見曾守仁：〈「以其能觀也」迄於「文化託命之人」——論王國維的悲劇洞見〉，《政大中文學報》第28期（2017年12月），頁281-328。

¹¹⁵ 王國維：〈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謝維揚、房鑫亮主編，駱丹、盧錫銘、胡逢祥、李解民副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39。

¹¹⁶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人生及美術之概觀》，謝維揚、房鑫亮主編，駱丹、盧錫銘、胡逢祥、李解民副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卷，頁57-58。

紮大切奇尼亞山，¹¹⁷ 伐林時突然遭到敵軍襲擊，導致人員喪生。故事並不專注在兩軍交戰、軍人抗敵的景況，反將全副心力描寫軍旅生活，著墨人物瑣碎、無心的「交談」，反映士兵長期駐軍在外的蒼涼心境。這些紮營休息時的交談，迎戰時的喊話，夜晚營帳裡軍人的喧鬧，以及對景物的細緻書寫，在晚清小說中尤為罕見。《枕戈記》以冷峻哀戚的觀察視角，反思戰爭下的人民、家庭、國家、貧富差距、生死存亡等議題，發人省思。

筆者比對《枕戈記》的翻譯語言、風格，高度契合托爾斯泰的思想。王國維對托爾斯泰的崇敬，可從《教育世界》頻繁刊登〈托爾斯泰伯爵之近世科學評〉、〈脫爾斯泰之四戒〉與〈脫爾斯泰傳〉窺得。1907年的〈脫爾斯泰傳〉，書寫年幼喪母「早失怙恃」，求學階段「沉鬱懊喪」，¹¹⁸ 高加索從軍經驗對其文學發展具有重大影響：

一千八百五十一年，時二十四歲……，其屯戍之所，則高加索之山麓，台列克之河畔也。故是役也，於脫之文學生涯，實有莫大之影響焉。高加索地方，本可謂俄國文學之產地，其間雪山蜿蜒，積白萬里，海波泱泱，湛碧千尺，朔風匹馬，祇聞蕭殺之聲。落日大旗，都作淒涼之色，凡在深情之少年，豪氣之武夫，覩茲風物，猶足移情，而況天才磅礴，思想超妙，如脫爾斯泰者乎？噫，脫之得為世界文豪，雖謂為高加索地方之贈可也！¹¹⁹

高加索「從軍經歷」使托爾斯泰能眼觀山巒、白雪之色，耳聞蕭瑟、殺戮之聲，影響創作甚深。「從軍」的體驗驅使著他寫出名著《戰爭與和平》，登上「世界文豪」之位。傳記也特別強調，高加索山的景物讓少年或武夫皆「覩茲風物，猶足移情」，尤見「風物」書

¹¹⁷ 托爾斯泰：《枕戈記》，《教育世界》第102期，頁1。

¹¹⁸ 〈托爾斯泰傳〉，《教育世界》第143期，頁1、5。

¹¹⁹ 〈托爾斯泰傳〉，《教育世界》第143期，頁6。

寫，具有充沛的「情思」。此點回應了王國維刊登、譯介《枕戈記》的緣由，「靚茲風物，猶足移情」便是《枕戈記》最為出色、動人之處。

小說敘事樸實細緻，節奏緩慢，無處不寫。除卻記錄軍旅生活、記錄軍人談話外，尤為凸顯「從軍當下」的「時間感」。譯者使用「時近」、「方斯時」、「相較先時」等詞彙，表現征人對「時間」或「時光流轉」的感受。敘事者以五官感受時景，文字綿密，逐一鋪陳，景色反映人物當下的內心世界，情景交融：

時近薄暮，浮雲蔽空，暝色漸合，寒霧濛濛，結為細露，襟袖沾濡，地面瀟滑，稍一舉步，輒虞失足。加以寒意逼人，足下雖御長韉，尚覺其冷而濕，風聲颼颼，刮面欲裂。方斯時也，猶聞兵卒等嘖嘖偶語，若甚歡暢，然予則晝間一戰，身心既疲，腹又苦飢，故意亂心煩。¹²⁰

時間為「薄暮」黃昏，敘事者回想早上經歷一場大戰，身心俱疲、飢餓難忍，面對著夕陽將落，天空布滿浮雲，夜晚即將來臨。露水將他的衣袖沾濕，軍靴內的雙腳也感到寒冷，狂風無情「刮面欲裂」。透骨的寒意、刮面的冷風，心情自然慘澹，軍士們在此艱辛的環境中，只能苦中作樂，更增無奈。譯者鋪寫綿密的文句，陳述冷冽的景緻，映照人物心情和狀態，將戰場上的光景、氛圍帶到讀者眼前，共同感受這無以為繼的軍旅生活，以及無法抑止的忐忑不安。

《枕戈記》利用環境與景色，書寫「戰場現場」，流露日復一日的無奈軍旅，包含森林草木、露水野火，以及撒落在金屬武器上的陽光等，萬事萬物，各色各景，在王國維細膩的譯筆下，一處不落：

荒郊殘雪，離離被野，灌木叢生，枝條森然，砲車之輪輾柔條而過。……時東方漸白，四圍之物次第，出自暗中，覺砲架與

¹²⁰ 托爾斯泰：《枕戈記》，《教育世界》第102期，頁26。

彈藥箱之上，露華湛然愈滴，倏忽間旭日東昇，萬象畢露。遙見前隊兵士，跨赤馬，荷長槍，槍尖閃閃，其光奪目。……枝上冰雪融化，滴於火有聲，頃刻而成熾炭，近地短草，以為火氣所逼，至作枯白色，然各卒伐木添薪，猶未已也。¹²¹

小說裡的征場生活「萬象畢露」，無論是荒郊、雪景、植物、旭日，或車輪輾壓雪地之聲音、冰雪滴於火堆之聲響，以及陽光灑在槍尖的光芒。作家刻意放慢速度，詳盡描繪場景，逐字逐句刻劃了戰場日復一日、無窮無盡的「時間」感受。軍人們在戰場環境裡，擔憂敵軍不知何時突擊，恐懼死神不知何時降臨，僅能藉景抒懷，表達時間漫長與心情煎熬。譯者全然掌握原著精神，同時融入自身特殊的審美「意境」，再現戰場生活，使譯本和原著產生互動和交流。

王國維的「意境」不只發揮在詩、詞中，更實踐在其譯介方式上，¹²²《枕戈記》便是最佳案例。《枕戈記》大量書寫景色、器物、時間與人物心境，筆法高超，造景自然、感受鮮明、物我合一。王國維巧妙地融合了原著「寫實」宗旨、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末世頹廢」。¹²³經由譯介，王國維讓讀者身歷其「境」，感受小說裡的時、空維度，營造一個遠在高加索，既知而又未知的戰地風光：

¹²¹ 托爾斯泰：《枕戈記》，《教育世界》第100期（1905年），頁2-3。

¹²² 葉嘉瑩分析王國維「意境說」：首先，「各有情意方面之感受」，乃指「特別注重作者個人的感受」；其次，儘管非五官直接感應，但「吾人內在之意識中確實有所感受」；最後文學創作「造景」、「寫景」必須合乎自然。見葉嘉瑩：〈論王國維詞：從我對王氏境界說的一點新理解談王詞之評賞〉上，《中外文學》第18卷第3期（1989年8月），頁7-9。

¹²³ 孫隆基：〈清季「世紀末思潮」之探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0期（2015年12月），頁147-153。關於王國維受到叔本華、康德、尼采之影響，前人論述已完備，恕不羅列。《教育世界》刊登叔本華、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等介紹文章繁多，可見：〈德國哲學大家叔本華氏〉（1904年）、〈書叔本華遺傳說〉（1904年）、〈尼采氏之學說〉（1904年）等。

方是時也，紅暎杲杲，已高懸於樹梢，白露橫遮，如在隔幔。遙望東角，則大空之色，隱隱於灰碧之中，略帶紅紫，以較先時，覺漸推而漸廣矣，薄露如乳，猶濛濛然。界長空之一角，然以較先時之橫蔽目前者，覺益退而益遠矣。茂林既伐，而漠漠曠野，見於前面焉。見篝煙四起，縈紆而直上，有作黑色者，有作白色者，有尚作淡紅色者，和以淡霧。驅以微風，乃蜿蜒而四散，一如怪物之漂流疾走也。¹²⁴

傍晚「方是時也」，夕陽紅潤掛於天際，天空、雲霧和篝煙交替出現，將荒野染上灰、紫紅、黑、白、淡紅等色彩，千變萬化、瞬息萬變。當風吹動，雲霧和篝煙仿若神秘的怪物，四處漂散、快速疾走。從飄渺的雲霧和篝煙，到各種顏色的流轉，抽象的「時間」被比喻為具象的「怪物」，足具動態美感。「時間」的刻劃，增加敘事的想像力道，同時凸顯戰場生活的變幻莫測，每分每秒都惶惶不安。「以較先時」一再出現，隱含戰場上的「時間」就是一個「怪物」，它帶走了所有希望、青春和生命，也吞食了未來。

王國維除了運用描繪景物，塑造戰場漫長的時間感，還深入探討軍人們的內心，挖掘未被關注「從軍以後」的痛苦與悲哀，具有厚重的文學氣息和藝術層次。時間流淌在《枕戈記》文字裡，洩露戰爭的「無奈」和「徬徨」，顯得無比抒情與哀傷。暴露了被晚清作者省略、忽視的軍旅現實，如日常物資缺乏，生存不易的各種難處：

時軍中尚無燃炭之惡習，大都支杙作床，和衣而臥，以重裘掩體，皮冠覆額而已，予歸營後謀熟睡，以此身將瀕死地，胸次騷然不安，夢不能穩，雖強自排遣，而明日之戰事，終耿耿於心也。¹²⁵

¹²⁴ 托爾斯泰：《枕戈記》，《教育世界》第100期，頁14。

¹²⁵ 托爾斯泰：《枕戈記》，《教育世界》第102期，頁1。

晚清小說大多渲染軍人參戰的愛國情操、仗義壯烈，但從軍後的生活，卻乏人問津。《伐林記》展演了讀者聞所未聞，無法想像的真實景況，揭露戰場上的痛苦與艱辛。除了日復一日地輪班守衛外，戰士支杖為床、重裘為被，粗糙的衣物難以保暖，更不用說面對未知的將來、無端的戰事，諸多煩擾，繚繞於心。這些生活的焦著和困頓，在王國維的譯筆下展露無疑。《枕戈記》不僅是托爾斯泰的小說，譯文也詮釋了王國維的生命哲學，如此悲痛憂鬱、無以為繼。

這些無奈和焦慮，以看似流水帳般的文字平實闡述。如主角詢問連長：「君既不好高加索，何為來此？」身為一連之長竟然回答：「誤於人言爾！」表示從軍乃因「誤解」而來。連長又言：「居本國時，屢聞人言，高加索地方有堅水積雪，終古未消，有急流奔湍，一瀉千丈，居人大率配短劍、披氈裘，馳騁於黃沙白草之間。吾想像其風景，則以為雄麗宏壯，莫是過也。及今觀之，適令人意緒惡劣……。」¹²⁶ 連長原以為高加索山，環境十分高雅、清淨，為絕佳的避世之處，前來此做兵的軍人，個個威武雄壯。參軍後才發現真相不如預期，所謂「征場風光」、「得勝榮耀」全是以訛傳訛：

僕之來，誠不料敵情如此，初謂遠遊高加索，可一洗隱憂，而孰料去一俗世界，仍入一俗世界乎！曩居內第，猶幸地闊天空，容我放縱，而此間則狹隘汗穢，一舉一動即有苦勞恥辱，與一切可憎之事隨之，使予自覺其心術，有日趨卑下者，況僕之忝任斯職，殊不相宜，設想前途，只祇覺滿地荊棘耳，嗚呼噫嘻！豈予之過於膽怯哉！¹²⁷

通常晚清戰爭敘事裡，軍階高、年齡長的「長官」、「將軍」，多以長者身分期許少者繼承國家大任，或激勵下屬提升戰力、爭取奪勝。在《枕戈記》卻一反常態，連長竟然不是因為「報效國家」、「抵抗

¹²⁶ 托爾斯泰：《枕戈記》，《教育世界》第102期，頁18。

¹²⁷ 托爾斯泰：《枕戈記》，《教育世界》第102期，頁18-19。

外敵」選擇到高加索山當兵，反倒坦承自己出身卑微的「隱憂」。暴露了國家衰敗，貧富差距極大，窮苦人民生存不易，只能投靠「從軍」另謀生路。未料「從軍」實則踏入了另一個更為勞苦、恥辱、可憎與汙穢的世界。

《枕戈記》運用深刻且直白的對話，娓娓道出軍旅生涯的喜悲，軍人在「成敗得失」裡掙扎。若有功績獲頒勳章，便可結識貴族「曩于五十二年赴丹波福，所至張皇欸待，視予如親貴大臣，一夕赴縣令之招，眾推予為上客，殷殷然述傾倒意」。¹²⁸ 然而，建功談何容易，軍旅生涯的困頓、殘破，卻擺在眼前。「食俸雖倍於前，然猶虞不足，……袴襪之屬，究非月易數次不可以，靴言一月即敝，此外又必購衫衣手巾足纏等。故精而核之，既一錢不剩矣。」¹²⁹ 生活困難，毫無積蓄。個人成、敗皆與建功立業相關，甚至影響社會地位，即便想告老還鄉，也必須考量家中經濟狀況，顧及家人心情：

樂莫樂於歸家乎！富當無論矣，即貧而歸，助家人治經生，舉足團圓，亦可自樂。……予惟兄弟二人，歸亦何所戀，家人汲汲謀生之不暇，安得更有餘食，養我遠歸之老兵。予在軍中二十五載，從未贏一錢寄家，家人之安否，今亦未可知矣。¹³⁰

征人最盼望離開戰場，回家團圓、共享天倫，然而離家數十載，不知家中狀況，家人可否安在？生計是否餘裕，能否接受自己返鄉？各種問題浮現在軍人的腦海，即便能夠離開戰場，仍有數不盡的擔憂擺在眼前。《枕戈記》正是晚清譯介戰爭小說的〈行路難〉，暴露了軍人們的「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¹³¹ 軍人在軍旅中面臨未知與困難，出生入死，朝不保夕，如何不令人感嘆心傷。

¹²⁸ 托爾斯泰：《枕戈記》，《教育世界》第111期（1905年），頁31。

¹²⁹ 托爾斯泰：《枕戈記》，《教育世界》第111期，頁32-34。

¹³⁰ 托爾斯泰：《枕戈記》，《教育世界》第111期，頁42。

¹³¹ 李白著，鮑方校點：〈行路難三首〉，收於《李白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28。

前述《少年軍》系列小說，表達少年從軍的遠大抱負，《義勇軍》激昂教育「行軍戰略」，以利國家武備。王國維翻譯的《枕戈記》反而瓦解晚清「從軍報國」的夢幻想望，深入剖析從軍後的「人物心理」。《少年軍》「老大」與「少年」世代承繼的樣態，來到《枕戈記》反而為「長官」向「下屬」坦露「萬不得已」的從軍心情；《義勇軍》殷切的「教戰守則」，至《枕戈記》卻只剩下「前途茫然」、「人生徬徨」的辛酸苦果。《枕戈記》的「坦白」、「寫實」，在晚清「軍事小說」裡實屬罕見，書寫軍人們對戰況的不安，對死亡的膽怯，以及對自我價值的懷疑，藝術價值遠超當時同類型作品。

原著《伐林》描寫思鄉軍人在悲涼夜晚，吟唱俄國民謠《小白樺》後潸然淚下。小說雖未完整譯出歌詞，但白樺樹乃俄羅斯的國樹，是祖國、故鄉的神聖象徵。19世紀俄國也曾以「白樺」民謠，創作讚頌壯士、英雄的「衛國歌曲」。¹³² 吾人大致可推測，《小白樺》是一首抒發離人鄉愁，表達軍人漂泊的歌曲。日文版《つゝを枕》翻譯此歌謠名稱為《樺の木》，王國維譯本卻以中國晚唐詩人陳陶的〈隴西行〉取而代之：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¹³³

王國維於〈隴西行〉後加上「代用」兩字，雖然無法推敲他是否確切知曉《樺の木》內容，但其代用這首〈隴西行〉，可謂他對小說

¹³² 1812年的衛國戰爭在民歌內有廣泛的反映。有一整套和口傳的民間創作有聯繫……。這些歌曲在它們的內容和音樂詩歌的形式上是非常多樣化的。有時在這些歌曲內是利用民間創作的古老傳統手法。例如，其中有些歌曲是貫串著史詩的，壯士歌敘述的風格。見凱爾第什（Ю. Келдыш）著，張洪模譯：《俄羅斯音樂史（十九世紀上半期）》（北京：音樂出版社，1957年），頁9-10。

¹³³ 托爾斯泰：《枕戈記》，《教育世界》第111期，頁41。

下的註腳。戰場上勇猛的將士讓妻子獨守空閨，前往戰場防守家園、抵禦外敵，最終卻化作殘破的屍骨。王國維掌握了托爾斯泰《伐林》的旨意，最起碼不再將「戰爭」與「保家衛國」畫上等式，但也僅止步於戰爭的殘忍與無情，未再深入檢討國家暴力、社會階級、貧富差距等問題。這或可歸咎於當時俄國與中國社會的差異，身為俄國知識分子的托爾斯泰，支持無政府主義、重視哲學教育與身心修持，體恤低層與弱勢。反觀晚清中國，正面對國破家亡的險境，急切需要救亡圖存的方法，根本無暇處理其他議題。托爾斯泰暴露政府不義、反省社會不公的思想，或許是《教育世界》主編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無法體會和實踐的層次。縱使，晚清「無政府主義」興起，有志之士走向暗殺、革命一途，卻始終無法與彼時興盛的「國家」潮流制衡，只能無疾而終。¹³⁴

《枕戈記》精湛之處乃敘事不再囿於「愛國」框架，描述了「參軍」的一體兩面，及對戰爭的反思、人性的探索。故事聚焦在國家／個人、大我／小我的利益掙扎裡，凸顯了國家權力不斷擴張後，人民被迫走上戰場之無奈。《枕戈記》在晚清戰爭敘事裡，無論是內容、風格或技法皆鶴立雞群。至於，晚清小說何以無法發展出該類型故事的原因，或許是迫於富國強兵的焦慮，只能不斷的索求少壯人力，完善軍事體系、擴充戰略軍備，再無餘力思考其他。可惜，晚清中國尚未抵達「富國強兵」目標，便折損在「富國強兵」的路途中。

六、小結

本文討論晚清譯介戰爭小說的「政治」、「軍事教育」與「戰爭反思」三種傾向。從小說內容、敘事方式及譯介過程，各自發揮了晚

¹³⁴ 劉小楓：〈無政府主義與現代中國社會思想的嬗變〉，許紀霖編選：《現代中國思想史論》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647-658。

清譯者不同的邏輯、考量，並開展跨界文化的多元色彩，樹立特殊的敘事典範。

十九世紀的「戰爭」潮流，因譯介來到晚清。譯者憑藉國情需求，對原著進行「再詮釋」。因應晚清救國需求，號召「少年從軍」的《少年軍》系列小說，描繪離開家庭、學校、情人，奮然從軍的少年，或向外求援，為國奉獻，或傳承救國使命、達到世代交替。小說不僅傳達「少年軍」的果斷正直，譯者陳景韓也「偷渡」了自身的成長經歷。莫泊桑作品《俘虜》經由日本翻譯後輾轉來到中國，譯為《義勇軍》。譯者楊與齡因應刊登《南洋兵事雜誌》，讀者為未來的將士，所以大幅改變內容。修改主人翁性別、增添戰略步驟、軍事教育情節，並著重書寫國軍抗敵勇猛、戰場傷亡慘烈，宛若「教戰守則」。因大量譯寫的緣故，《義勇軍》和原著《俘虜》大相逕庭，形式偏向「軍事教育」、「教戰守則」，凸顯晚清力求軍事的完備與救國的強烈。然而，晚清文壇一片宣導政治和軍用的氛圍下，托爾斯泰《伐林》的中譯版《枕戈記》，與眾不同，獨樹一幟。王國維的譯介策略保留了托爾斯泰的文學風格，並加入自身的審美意境，使《枕戈記》呈現超然藝術價值。小說凸顯戰爭的殘忍，傳遞人道信仰和人性反省，並利用大量的對話、景物描述、內心獨白等方式，緩緩道出征人長年在外，軍旅生活的無奈和悲苦，顯見譯者文學思想的前瞻性。

總體而言，晚清譯介戰爭小說，無論是訴求「少年從軍」的政治考量，或是譯介策略趨向教戰的實用功能，還是突破「救國」框架，講求人道精神，皆內容豐富、層次鮮明，於近代中國展現多元的成果。

徵引書目

- 《兵事雜誌》，杭州：浙江兵事雜誌社編輯，1914年-1926年。
- 《南洋兵事雜誌》，南京：兵事雜誌社編輯，1906年-1911年。
- 《浙江潮》，東京：浙江同鄉會雜誌部，1903年。
- 《教育世界》，上海：教育世界社，1904年-1907年。
- 《新小說》，橫濱：新小說社，1902年。
- 《新民叢報》，橫濱：新民叢報社，1900年-1906年。
- 《新新小說》，上海：新新小說社，1904年-1907年。
-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 三浦國雄著，王標譯：〈道教中的老翁與嬰兒——時間的潮流〉，
《不老不死的欲求：三浦國雄道教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407-418。
- 王述坤編：〈《浮雲》與二葉亭四迷〉，《日本現代文學：名家及其代表作》，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4-25。
- 王國維著，謝維揚、房鑫亮主編，駱丹、盧錫銘、胡逢祥、李解民副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
- 未標示作者：〈莫泊桑生平與創作年表〉，收於莫泊桑著，李玉民譯：《莫泊桑短篇小說選》，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2014年，頁250-254。
- 左鵬軍：《晚清民國傳奇雜劇文獻與史實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 甘麗娟：〈寫實主義理論在日本近代的發展與變異〉，《齊魯學刊》第4期，2010年7月，頁124-127。
- 吉田薰：〈梁啟超與《太陽》雜誌〉，《學術研究》2008年第12期，

頁140-160。

吳洪成：《中國近代教育思潮新論》，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6年。

佚名：《義勇軍》，《大陸報》第3卷第4、5期，上海：大陸報總發行所，1905年，頁10-14、1-7。

呂順長：《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宋明煒：〈青春想像〉，《批評與想像》，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49。

李慧：《德富蘆花文學所受托爾斯泰的影響——以小說《黑潮》與隨筆集《自然與人生》、隨筆〈謀叛論〉的關係為視域》，上海：華師師範大學日語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李白著，鮑方校點：《李白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李志梅：《報人作家陳景韓及其小說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李艷麗：〈虛無黨小說與無政府主義思潮考〉，《晚清日語小說譯介研究（1898-191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頁48-52。

汪暉：〈聲之善惡：什麼是啟蒙？——重讀魯迅的《破惡聲論》〉，《聲之善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頁3-89。

辛亭亭：《陳景韓「三重身分」解讀》，江蘇：蘇州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頁6-14。

周曉明：〈從《塞瓦斯托波爾故事集》看托爾斯泰的藝術思想〉，《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1986年3月，頁108。

柳亞子：〈《慘社會》與《慘世界》〉，蘇曼殊著，柳亞子編訂：《蘇曼殊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16年，頁359-362。

- 柳宗元著，王國安箋釋：《柳宗元詩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柳鳴九：《柳鳴九文集》，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年。
- 胡石庵：〈烈士唐才常事略〉，收於杜邁之輯：《自立會史料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頁203。
- 胡適著，杜春和等編：《胡適演講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孫隆基：〈清季「世紀末思潮」之探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0期，2015年12月，頁147-153。
- 徐靜波：〈明治時期日本翻譯文學述論〉，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研究論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56-468。
- 高玉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 康有為著，馬洪林、盧正言編注：《康有為集（政論卷）》，上冊，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
- 張艷：〈陳冷血兩篇翻譯小說的日語底本——兼析明治文學的影響〉，《清末小說》第35期最終號，2012年12月，頁143-157。
- 張江寧主編：《外國名家重大軍事改革述評》，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5年。
- 張曉軍：《近代國人對西方體育認識的嬗變1840-1937》，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 強勇傑：〈《慘世界》譯者的爭議：答案就在文本細節裡〉，《翻譯學研究集刊》第18輯，2014年12月，頁69-100。
- 強勇傑：〈蘇曼殊《慘社會》的底本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8期，2015年6月，頁187-266。
-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

- 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6月，頁249-276。
- 梅家玲：〈教育，還是小說？——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收於陳平原等：《教育：知識生產與文學傳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97-135。
- 莫泊桑著，張波譯：《莫泊桑短篇小說選》，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
- 許圖南：〈老畫師楊太晚先生〉，李植中、馮鳴儀主編：《鎮江文史資料》第17輯，鎮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鎮江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0年，頁144-146。
- 郭延禮：〈托爾斯泰小說的第一部中譯〉，《中華讀書報》，2000年4月20日。
- 郭浩帆：〈《新新小說》主編者新探〉，《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頁100-103。
- 陳宇翔編：《譚嗣同唐才常與維新運動》，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60-273。
- 陳宏淑：〈譯者的操縱：從Cuore到《馨兒就學記》〉，《編譯論叢》第3卷第1期，2010年3月，頁41-68。
- 陳建華等著，陳建華主編：《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俄蘇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年。
- 陳建華編：《文學的影響力——托爾斯泰在中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
- 凱爾第什著，張洪模譯：《俄羅斯音樂史（十九世紀上半期）》，北京：音樂出版社，1957年。
- 彭勇穗：《形變與值變：文學陌生化語言的翻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
- 曾守仁：〈「以其能觀也」迄於「文化託命之人」——論王國維的悲劇洞見〉，《政大中文學報》第28期，2017年12月，頁281-

328。

- 程翔章：〈中國近代文學家對托爾斯泰的認識和介紹〉，《晚清文學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廣東出版公司，2014年，頁145-154。
- 華特·班雅明著，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黃靜：《晚清民國時期中國文學的歡場書寫研究》，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
- 愛米契斯著，蕭天助譯：《愛的教育：世界文學名著》，臺中：曾文出版社，1975年。
- 楊傳鑫：《世界文化與文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楊鳳輝：《南皋筆記》上，上海：上海進步書局，1912年。
- 葉嘉瑩：〈論王國維詞：從我對王氏境界說的一點新理解談王詞之評賞〉上，《中外文學》第18卷第3期，1989年8月，頁4-30。
- 維克多·雨果著，李玉民譯：《悲慘世界》，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20年。
- 劉小楓：〈無政府主義與現代中國社會思想的嬗變〉，許紀霖編選：《現代中國思想史論》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647-658。
- 劉亞丁：〈19世紀高加索戰爭的文學再現——以萊蒙托夫和列·托爾斯泰的行旅和創作為例〉，《俄羅斯研究》第2期，2011年4月，頁30-46。
- 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要略（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
- 歐茵西：〈托爾斯泰的寫作藝術〉，《中外文學》第3卷第12期，1975年5月，頁140-150。

- 潘世聖：〈近代日本雜誌媒體的「中國」與「中國言說」——關於綜合雜誌《太陽》（1895-1928）研究〉，袁筱一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外語論叢》第2輯，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65-178。
- 潘懋元、劉海峰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741-742。
- 蔡登山：〈「外冷心熱」的報人與小說家陳冷血〉，《洋場才子與小報文人》，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頁3-15。
- 鄭青：〈簡述近現代日本的俄國文學輸入〉，鄒東來、程千山主編：《東北亞語言文化研究》第1輯，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64-65。
- 鄭克魯編著：《法國文學史2》，上海：商務印書館，2018年。
- 謝天振：《譯介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
- 關詩珮：〈從林紓看文學翻譯規範由晚清中國到五四的轉變：西化、現代化和以原著為中心的觀念〉，《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8期，2008年8月，頁343-372。
- 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事長編1901.1-1903.12》第3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年。
- 蘇珊·巴斯內特、安德烈·勒菲弗爾：《文化構建：文學翻譯論集》，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
- 闕文文：《晚清報刊上的翻譯小說》，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
- ウクトル・ユーゴー著，抱一庵主人譯述：《ABC組合》，東京：內外出版協會，1903年。
- エドモンド・デ・アミチス著，抱一庵主人重譯：《伊国美談：十二健兒》，東京：內外出版協會，1902年。
- モーパッサン著，橋本青雨譯：《義勇軍》，《太陽》第10卷第13號，東京：博文館，1904年，頁108-115。
- レフ・トウストイ著，二葉亭譯：《つゝを枕：軍事小説》，東京：

- 金港堂，1904年。
- 二葉亭四迷著，十川信介、安井亮平編輯：《二葉亭四迷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84年。
- 大木葉子：〈原抱一庵「少年 一小説新年」論—その固有性の内実について—〉，《日本文芸論稿》第36號，2013年9月，頁1-12。
- 木村彰一：〈二葉亭のツルゲーネフものの翻訳について〉，《文学》第24卷第5號，1956年，頁41-49。
- 吉田作造：〈少年時代の追憶〉，《文芸春秋》，東京：文芸春秋9月号，1926年9月，頁65-69。
- 徳富蘆花：《トルストイ》，《十二文豪》第10卷，東京：民友社，1897年。
- 徳富蘆花：《順禮紀行》，東京：警醒社，1906年。
- 徳富蘆花編：《少年軍（南北戦争の花）》，《近世歐米歴史之片影》，東京：民友社，1893年，頁125-141。
- 樽本照雄：〈トルストイ最初の漢訳小説——「枕戈記」について〉，《大阪経大論集》第50卷第6號，2000年3月，頁383-394。
- De Amicis, Edmondo. *Cuore*. New York: H. Holt, 1896.
- De Maupassant, Guy. *Contes choisis: Les prisonniers; L'auberge; L'aventure de Walter Schnaffs; Amour; Deux amis; La peur; La mère sauvage*. London: Bell, 1927.
- Hugo, Victor. *Les misérabl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64.
- Тол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Рубка леса*. Москва: Воениздат, 1947.
- Song, Mingwei. *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